

# 孚社及其詩學考論

謝明陽

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 一、前言

明代文人好結盟立社，藉以相互標榜，彼此引重。其中若干思想性較強的文人集團，更有意透過群體的力量來宣揚文學理念，藉以改革詩文創作的風氣，因而發展成為文學流派。此一結社風潮，至清初猶然。不過，清初的明遺民雖亦盛行結社，其結社目的卻與明人不盡相同，如楊鳳苞(1753-1816)〈書南山草堂遺集後〉所云：

明社既屋，士之憔悴失職、高蹈而能文者，相率結為詩社，以抒寫其舊國舊君之感，大江以南，無地無之。<sup>1</sup>

就時代背景而論，亡國臣民歌詠黍離麥秀之悲以相慰藉，確實可視為遺民詩社在清朝初年紛起並出的一項關鍵因素；再由「大江以南，無地無之」一語來看，又可知當時的遺民結社尤盛行於江南。

關於明遺民結社的研究成果，前有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後有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結社研究》。晚出的何宗美書曾廣泛蒐求清初的明遺民社團，初步考得五十餘例<sup>2</sup>，此一數字雖非當時遺民結社的實際數量，但已不可謂不多。惟明遺民的結社本具有某種程度的隱密性，加上相關史料的散佚亡闕，使得這些遺民群體的活動情況多半已難詳而論之。以本文所要討論的「孚社」為

<sup>1</sup> [清]楊鳳苞：《秋室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續修四庫全書》，第1476冊），卷1，頁15b-16a。《南山草堂遺集》，明遺民葉繼武(1615-1673)著；繼武，字桓奏，江蘇吳江人。

<sup>2</sup> 參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結社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309-315。

例，此社於遺民志節、詩學思想兩方面皆深具特色，但因資料訪求不易，歷來學者僅對之作簡單介紹，尚未進行深入的考察。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即未述及孚社，僅在〈清初東北流人考〉一文中曾稍稍提及<sup>3</sup>；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結社研究》對於孚社的描述，也只有寥寥數行<sup>4</sup>。正因為孚社的研究尚有大片空白，故本文將試圖透過史料的拼貼與重組，對孚社及其詩學進行一番探索，以揭示此一遺民詩社於清初詩學史上所具有的意義。

關於孚社的記載，以楊鳳苞〈錢瞻百河渭間集選序〉最為重要，此文開端云：「《河渭間集選》十卷，歸安錢价人瞻百撰，慈谿魏耕白衣為之敘。」指出《河渭間集選》的作者為歸安錢价人（?-1662），後並略述錢氏生平：

瞻百家世華廬，少工文詞，與同產弟三人並以詩名，斤斤守唐法，稱同調者，族人纘曾允武及白衣寓公也。……明季數試于布政司，不遇。國初郡人立孚社，推為領袖。<sup>5</sup>

可知孚社為清朝初年創立於浙江湖州府歸安縣之詩社，詩社領袖為錢价人，詩社成員至少還應包括與錢价人同守唐調的魏耕（白衣，1614-1662）、錢纘曾（允武，?-1662），以及錢价人之弟三人。另外，陳去病（1874-1933）於清末作《五石脂》，書中亦載：「瞻百家承華廬，少工文詞，與同產弟三人并以詩名，斤斤守唐法。亦居思溪，故與允武、雪竇稱同調，而雪竇又序其《河渭間集》云：『明亡之際，絕意仕進，乃創立孚社，為之祭酒。』」<sup>6</sup>所述內容與〈錢瞻百河渭間集選序〉相同，當即本於楊鳳苞之說。也因為楊鳳苞所提供的這條珍貴線索，讓我們可以依其提示，進一步考索孚社成立的相關問題。

至於孚社詩學仍具備探討的可能，則有賴《今詩粹》一書的傳世。觀楊賓（1650-1720）〈魏雪竇傳〉載魏耕事跡云：

鼎革後，披髮為僧裝，來往江湖間，以詩名。方是時，同邑孝廉張煌言聚兵海上，與鄭氏為聲援，耕亦自負相交通。又與先子及湖州錢瞻伯、錢纘曾、潘廷聰、山陰祁班孫輩為氣節交。……初耕與錢瞻伯選《今詩粹》，而附己詩於後，難作版燬，多不傳。<sup>7</sup>

<sup>3</sup> 謝國楨：〈清初東北流人考〉，《明末清初的學風》（上海：上海書店，2004年），頁129-130。

<sup>4</sup> 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結社研究》，頁312-313。

<sup>5</sup> 楊鳳苞：《秋室集》，卷1，頁8b-9b。

<sup>6</sup> 陳去病著，甘蘭經等點校：《五石脂》（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頁382-383。

<sup>7</sup> [清]楊賓：《楊大瓢先生雜文殘稿》（上海：上海書店，1994年《叢書集成續

又可知，以氣節相交的魏耕、錢价人曾合力編選《今詩粹》一書，並附魏耕詩於後。康熙元年(1662)，魏、錢二子涉入通海案而遇難<sup>8</sup>，此書也因而遭到燬版，以致於傳世甚希。幸運的是，非僅魏耕的《雪翁詩集》至今仍流傳於世，《今詩粹》也同樣倖存於天壤，成為我們討論孚社詩學時最重要的憑據。

衡諸錢价人、魏耕的遺民身分與詩學立場，可以說，孚社諸子同時面臨了「生命」以及「詩學」的難題。就前者而言，身為前朝遺民的孚社詩人生存於清朝，卻又心懷大明故國，在外境與內心的衝突之下，他們究竟該如何追尋個人生命的存在價值？就後者而言，孚社「斤斤守唐法」的詩學觀近於七子一派，而當復古詩論已成為前朝舊說時，孚社詩人對於自己所堅持的詩歌之學，又該如何創造出新的時代意義？這兩個問題的解決之道，也正是我們考論孚社及其詩學時必須剖析的核心議題。

## 二、孚社的成立

一個理想詩社的組成，除了負責統籌擘畫的領導者之外，至少還應具備下列三項條件：一為物質條件，即充足的財力物資與活動空間；二為精神條件，即立社宗旨以及社員們的共同理想；三為人員條件，即必須有一群志同道合的詩人群居相切磋。本節即由此三個層面考論錢价人創立孚社的相關問題，以作為後文討論之資。

楊鳳苞〈錢瞻百河渭間集選序〉述錢价人家世云：

瞻百居歸安思溪，兵部武選郎中鎮之曾孫，巡撫山東僉都御史士完之孫，吏部文選郎中元愨之子。錢氏世居烏程之陽泰里，遷思溪自武選始。<sup>9</sup>

錢价人之曾祖為錢鎮，祖父為錢士完，父親為錢元愨(?-1653)，參諸史傳，可探知三人出處之大端。錢鎮，字守中，嘉靖三十八年(1559)進士，授武庫主事，遷郎中，洞悉天下邊關險害機宜，遇事慷慨論列，後以直道見擯坐免，還思

編》，第126冊），頁31-32。先子，指楊賓之父楊越(1622-1691)；潘廷聰，即潘龍基(?-1662)，通海案中受株連而坐法死。

<sup>8</sup> 魏耕的復明思想與通海案始末，詳薛瑞泉：〈魏耕和清初的「通海案」〉，《中國史研究》1989年第1期，頁115-119；何齡修：〈關於魏耕通海案的幾個問題〉，《五庫齋清史叢稿》（北京：學苑出版社，2004年），頁276-302。

<sup>9</sup> 楊鳳苞：《秋室集》，卷1，頁9a。

溪精舍講學，專意於著述<sup>10</sup>。錢士完，字惟凝，萬曆八年(1580)進士，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時青州連年大饑，士完力行荒政，請蠲請賑，活數十萬人，後告歸，卒贈副都御史<sup>11</sup>。錢元愨，字孺愿，天啓五年(1625)進士，思宗時遷武選司主事，抗疏請誅魏忠賢，疏下，海內傳誦，而魏璫竟伏誅，後改文選司郎中，弘光帝立，晉太僕少卿，乙酉後鍵戶不出，悒鬱成疾而終<sup>12</sup>。楊鳳苞謂錢价人「家世華廡」，即就其家世顯赫，曾祖以降三代皆為名宦而言；另一方面，「華廡」一詞亦可兼指錢价人家境之富裕。楊鳳苞文中提及：時有吳之榮者，曾任歸安知縣，因覬覦瞻百家產富厚，故密告於將軍柯奎，謂瞻百「累世顯宦，家富不訾，連絡山海，妄思噓燼」<sup>13</sup>。可見在父祖的庇蔭之下，錢氏一族確實累積了可觀的家產，藉此雄厚財力，錢价人欲廣招詩社同志，並負擔宴飲酬酢的相關費用，自當寬綽而有餘。

錢氏本世居烏程，自錢鎮始遷居歸安思溪；及至錢价人，又購得郡城南隅之蓮花莊為宅。錢价人有〈題顧樵水畫蓮莊圖〉一詩，詩前小序云：

余所居郡南隅蓮花莊，言是宋王孫趙子昂故址。所居湖水四周，葭柳間雜，頗饒勝概。後帶月湖，廣袤數十頃，中有紅蓼、白蘋二洲，今皆壅淤成列廬矣。大抵津途較前率不及半，然尚漭漭，每入春時，遊人載途，畫舫相亂，奇為佳觀。<sup>14</sup>

對照同治《湖州府志》所載：「蓮花莊，在府治東南，縣學南，元趙子昂別業，四面陂水環繞，水中多蓮，絕為幽勝。」<sup>15</sup>光緒《歸安縣志》亦載：「蓮花莊，在月河之東南，四面皆水，荷花盛開時，錦雲百頃，亦城中之所無。」<sup>16</sup>可知蓮花莊為元初趙孟頫故居，其地風光幽絕，為歸安一地之勝景。錢价人能購得如此

<sup>10</sup> [清]陸心源等修，[清]丁寶書等纂：《歸安縣志》（二）（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影印光緒八年刊本），卷35〈人物傳·儒林〉，頁6b-7a。

<sup>11</sup> 同前註，卷34〈人物傳·名臣〉，頁9b-11a。

<sup>12</sup> [清]陳濟生編：《啓禎遺詩》（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97冊），卷6，頁445；錢海岳：《南明史》（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5冊，卷32，頁1626-1627。

<sup>13</sup> 楊鳳苞：《秋室集》，卷1，頁9b。

<sup>14</sup> [清]陳焯編：《國朝湖州詩錄》（清道光庚寅刊本，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卷2，頁4a-b。陳焯，字暎之，浙江歸安人，乾隆貢生。非清初桐城陳焯（字默公）。

<sup>15</sup> [清]宗源瀚等修，[清]周學濬等纂：《湖州府志》（二）（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影印同治十三年刊本），卷26〈輿地略·古蹟二〉，頁9a。

<sup>16</sup> 陸心源等修，丁寶書等纂：《歸安縣志》（一），卷8〈古蹟〉，頁12a。

佳地以爲居所，仰賴的自然是富厚的家業，此地後來也就成爲孚社的根據地。此點，可從魏耕的詩作中得到驗證。魏耕有〈乙未七月二十六日郡城西蓮花莊寓齋作〉、〈蓮花莊與朱士曾〉、〈卜居蓮花莊〉、〈中秋蓮花莊懷人〉、〈蓮莊除歲謝菊旃子見遺玄宗皇帝御製徵道訣石刻作〉、〈喜蔣平階見訪蓮花莊蔣時奉玄擬棲隱雪上〉諸詩<sup>17</sup>，詩中記載了其寓居於蓮花莊的諸多生活片段。另外，〈冬杪奉陪吳會諸公宴吳興郡城蓮花莊二首〉更記錄了當時社集的情形，詩云：

縹緲西山雁影過，東臨紫氣動鳴珂；敦盤結客梁園勝，把酒論文吳下多。  
綺閣雲開天目雪，層城月湧洞庭波；相看耆舊關星象，倚檻從容一醉歌。  
嬌歌妍舞拂瑤弦，綺燭瓊花照曲筵；客醉雲山堪累月，時逢冰雪惜華年。  
明星寒動朱樓曙，沆瀣清流金掌懸；風雅吳興曾不減，願攜謝朓問青天。<sup>18</sup>

於冬末歲寒時節，魏耕與來自吳郡、會稽的詩人們群聚於錢价人之蓮花莊，諸公於此「敦盤結客」、「把酒論文」，以詩文風雅締結盟交，會場中並有「嬌歌妍舞」的聲色娛樂以及「綺燭瓊花」的華麗布置，足以想見當時宴飲達旦、賓主盡歡的盛況。此詩所記，可以視爲孚社唱和活動的縮影。

除了詩文應酬之外，孚社的成立當有更爲遠大的理想。此一問題仍可從〈錢瞻百河渭間集選序〉一文論起，楊鳳苞於文中刻劃錢价人性格云：

性傲，不畏強禦。通復社聲氣，好結納，傾囊倒篋不之吝，而自奉儉甚，敝冠破履、一青布袍，衣之數十年不易。<sup>19</sup>

可知性情剛烈、喜好布施結納的錢价人，在晚明時期即曾參與復社活動。鼎革後，錢价人作有〈存歿口號〉五首，藉以追懷或存或歿的復社友人，正表明了其爲復社中人，其中第二首寫的是復社領袖張溥(1602-1641)，詩云：

忽憶西銘張溥壇坵日，樓船簫鼓動湖濱；五人墓碣橫周道，折角威名震鬼神  
西銘有〈五人墓碑〉。<sup>20</sup>

詩作中，先是回憶了張溥主盟壇坵時樓船雲集、簫鼓喧天的社集場景，接著又讚揚張溥的〈五人墓碑記〉<sup>21</sup>鐫刻於墓碣，可使因對抗閹黨而犧牲的五位義士之威

<sup>17</sup> [清]魏耕：《雪翁詩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卷1，頁3、卷3，頁53、卷7，頁98、卷9，頁127、卷10，頁151、154-155。朱士曾，字敬身，浙江山陰人。蔣平階，字大鴻，原名雯階，字馭閣，江蘇華亭人。

<sup>18</sup> 同前註，卷10，頁157。

<sup>19</sup> 楊鳳苞：《秋室集》，卷1，頁9a-b。

<sup>20</sup> 陳焯編：《國朝湖州詩錄》，卷2，頁7a。

<sup>21</sup> [明]張溥：《七錄齋詩文合集》（《續修四庫全書》，第1387冊），《存稿》，

名震驚鬼神。由此推想，孚社的創立或與復社有所關聯。

這樣的推想，可以證諸吳偉業(1609-1671)〈致孚社諸子書〉。此篇書信的寫作肇因於孚社諸子相邀論學，吳偉業因病不克前往，故而作書交換學術意見，並寄寓勉勵之意。文中，吳偉業以「審學術」、「持品節」、「考文藝」、「化意見」四事來期許孚社成員，「審學術」一條指出：

偉業嘗親見西銘先師手鈔《註疏大全》等書，規模前賢，欲得其條貫，雖所志未就，而遺書備乙夜之覽，吾師不沒於地下矣。今諸公遵傳註而奉功令，務以表章六經，斥奇褻而補闕失，如此則西銘之遺緒將以再振。偉業昔見之於師者，今復見之於友，所謂學術之宜審者此也。<sup>22</sup>

張溥成立復社的目的在於「與庶方多士共興復古學」<sup>23</sup>，而通經致用正是興復古學的首要任務。明代經學係以明成祖時胡廣(1370-1418)等人奉敕編撰的《五經大全》、《四書大全》、《性理大全》為官方定本，漢、唐注疏因而受到冷落，張溥反對此一偏狹的治學方式，認為：「不讀註疏，無以知經學之淵流；不讀《大全》，無以正經義之紕繆。兩者若五官竝列，不容偏廢。」<sup>24</sup>張溥並且身體力行，致力於《五經註疏大全合纂》、《四書註疏大全合纂》等著作的抄錄編輯，試圖以遍治諸經、廣收古今注說的恢弘格局來改變學術風氣<sup>25</sup>。吳偉業書信中以「遵傳註」、「表章六經」期勉孚社諸子，即是希望諸子能擔負起重振經學的重任，以顯揚張溥崇尚古學的精神。於此可見，復社與孚社之間當有某種程度的傳承關係。

不過，孚社主要是一個詩社，較不具備學術性的色彩，其所繼承的復社遺風，實際上是顯現在砥礪氣節與詩歌復古兩方面，吳偉業書信中「持品節」、「考文藝」兩條內容正好透露了此一訊息。「持品節」一條云：

先達如山陰、橋李、歸安、練川、吳門諸先生，或講學而標正直之風，或清操而篤匪躬之誼，或三事公孤，或承明侍從，皆文章政事，彪炳一時，而遭患處變，風霜不改。今朝廷褒忠之典方下，無非欲維持名教，風勵人

卷3，頁1a-3a。

<sup>22</sup> [清]吳偉業著，李學穎集評標校：《吳梅村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下冊，卷54，頁1087。

<sup>23</sup> [清]陸世儀：《復社紀略》（《續修四庫全書》，第438冊），卷1，頁485。

<sup>24</sup> 張溥：〈五經註疏大全合纂序〉，《七錄齋詩文合集·近稿》，卷2，頁6b。

<sup>25</sup> 關於張溥的經學思想，可參劉莞莞：《復社與晚明學風》（臺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5年），頁79-84；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結社研究》，頁198-202。

倫。吾黨生於其鄉，景行在望，當於羣居論道之時，求顛沛不失之義。所謂品節之宜持者此也。<sup>26</sup>

此段文字以地名借代人名，所指稱的人物較難確認，我們以明清之際的史實對照吳偉業所述，可推測「山陰」指劉宗周(1578-1645)，「樵李(嘉興)」指徐石麒(1578-1645)，「歸安」指錢元愨，「練川(嘉定)」指侯峒曾(1591-1645)，「吳門」指徐汧(1597-1645)。諸先生所以能成爲人物典型，文章政事的表現尙屬次要，更重要的是諸公於世亂國變中均能凜然堅守君臣之大義。南都覆亡後，劉宗周絕食二十三日而卒，徐石麒朝服自縊而死，錢元愨鍵戶不復出，侯峒曾挈二子並沉於池，徐汧投虎丘新塘橋下死<sup>27</sup>，景行皆足以令人仰望。吳偉業列舉歸安周邊郡縣的忠節之士作爲楷模，目的在於提醒孚社諸子於群居論道時，當不忘懷前朝遺民所應操持的品節，此一人格理想的追求，可視爲孚社諸子群聚結社的精神基礎。再觀「考文藝」一條云：

弇州先生專主盛唐，力還大雅，其詩學之雄乎！雲間諸子，繼弇州而作者也；龍眠、西陵，繼雲間而作者也。風雅一道，舍開元、大曆，其將誰歸？至古文辭，則規先秦者失之摸擬，學六朝者失之輕靡；震川、崑陵扶衰起敝，崇尚八家，而鹿門分條晰委，開示後學。若集眾長而掩前哲，其在虞山乎！諸君子當察其源流，刊其枝葉，毋使才而礙法，毋襲貌而遺情。所謂文藝之宜考者此也。<sup>28</sup>

此條內容包含了詩學觀與古文觀兩個部分。就詩學而論，吳偉業的立場近於七子一派，特別推崇王世貞(1526-1590)專主盛唐的大雅之音，並視陳子龍(1608-1647)等雲間諸子爲王世貞的後起者，論述之意是希望孚社諸子能和方以智(1611-1671)爲首的龍眠派、陸圻(1613-?)爲首的西泠派一樣，遠祧弇州，近承雲間，以盛唐詩歌作爲考論文藝的依歸。就古文而論，吳偉業的立場近於唐宋派，文中叮囑孚社諸子當採納歸有光(震川，1506-1571)、唐順之(毗陵，1507-1560)、茅坤(鹿門，1512-1601)的意見，以唐宋八大家爲宗尙，至若當代作家，則應以取法集眾家之長的錢謙益(虞山，1582-1664)。然如前文所

<sup>26</sup> 吳偉業著，李學穎集評標校：《吳梅村全集》，下冊，卷54，頁1087。

<sup>27</sup> 錢元愨已見前文，劉宗周、徐石麒、侯峒曾、徐汧傳見〔清〕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第22冊，卷255，頁6573-6590、第23冊，卷275，頁7039-7042、卷277，頁7099-7100、卷267，頁6887-6888。及錢海岳：《南明史》，第5冊，卷30，頁1550-1561、1538-1540、卷32，頁1602-1604、卷31，頁1564-1566。

<sup>28</sup> 吳偉業著，李學穎集評標校：《吳梅村全集》，下冊，卷54，頁1087-1088。

述，孚社其實是一個詩社，孚社諸子主要也都是詩人，故此條所記，以前半段論詩部分較為重要，恰足以反映出孚社諸子欲步武陳子龍並追求盛唐音調的詩學思想。

以持品節、考文藝為精神活動的孚社創立於順治年間，詩社成立後，曾廣招吳越兩地的才俊入社。吳偉業〈致孚社諸子書〉即提到：「今諸君子溯江涉湖，戒舟楫，齎餼糧，不避風雨，重趼而至者，庶幾求英博卓犖之士，方雅正直之儒，輸寫腹心，講求德業。」<sup>29</sup>可見孚社諸子不以地域性的結社為滿足，反而有意擴大詩社的活動版圖與影響力，故而積極尋求可以交流情感、砥礪德業的同志。除吳偉業外，浙中名士吳農祥(1632-1708)也曾在受邀之列，《清稗類鈔》「吳慶百不入社」條載：

吳徵君農祥，字慶百，仁和人。……慶百識微見遠，時吳中人沿復社故態，角藝相徵逐，而浙西之讀書、秋聲、登樓、孚社等爭立名字應之，各欲得慶百以自重。慶百曰：「是載禍見餉也，諸君子忘東京鉤黨事乎？」不答書，書亦不發視。<sup>30</sup>

為了避免招致黨社之禍，吳農祥同樣沒有加入孚社。不過，此條記載視孚社為清初浙西的重要社團，可以推測，當時參與社集唱和的文士應不在少數。

就可以考定的成員而論，孚社的組成除領袖錢价人外，當以魏耕、錢纘曾二人最為重要。魏耕，字楚白，別字白衣，號雪竇，浙江慈谿人，入贅於歸安凌氏，故隸籍於歸安，明亡後嘗偕妻子卜居錢价人之蓮花莊<sup>31</sup>。錢纘曾，字允武，亦歸安人，為錢价人子姪輩族人<sup>32</sup>。屈大均(1630-1696)《皇明四朝成仁錄》嘗記魏耕、錢纘曾二人之交誼與死難之事：

魏耕，字雪竇，慈谿人。國變，棄諸生，志圖匡復，所交皆當世賢豪士。歸安以起義敗，亡命走江淮間，妻子滿獄弗顧。久之會解，乃與錢纘曾閉戶思溪習為詩，一時吳越人士，莫不傳誦。又與張近道、朱士稚交善。……有孔孟文者，從延平王軍中至，主耕，耕嘗給其資用。孟文以纘

<sup>29</sup> 同前註，頁 1086-1087。

<sup>30</sup> 徐珂：《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7冊，〈狷介類〉，頁3228。

<sup>31</sup> 傳見〔清〕魏霞：〈明處士雪竇先生傳〉，收入魏耕：《雪翁詩集》，卷17，頁195-196；〔清〕全祖望著，朱鑄禹彙校集注：〈雪竇山人墳版文〉，《鮚埼亭集》，卷8，《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上冊，頁174-179。

<sup>32</sup> 傳見〔清〕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錄》，卷12〈生員死義傳〉，《屈大均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第3冊，頁937。



曾饒富，有所求費，不饜，於是以畊所上煌言書首於敵帥。畊及纘曾被執，拷治不屈，遂駢死，妻子田宅盡沒。<sup>33</sup>

可知魏耕與錢纘曾不僅是從事復明運動的夥伴，同時也是相與論詩的好友，二人曾閉戶習詩於歸安思溪，即在此時，錢价人偕二人共同結立孚社。又魏耕嘗上書張煌言(1620-1664)，建議中興之計，後遭孔孟文首告，魏耕與錢纘曾皆被執就義，錢价人亦因同案而遇難。由此觀之，孚社除了是遺民詩社之外，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視為是一個反清復明的組織。

前引屈大均文提到，魏耕、錢纘曾「又與張近道、朱士稚交善」，朱士稚(1614-1660)之生平可參見朱彝尊(1629-1709)〈貞毅先生墓表〉：

貞毅先生，姓朱氏，諱士稚，字伯虎，更字朗詣，世居山陰怪山下。……所最善者一人，曰張生宗觀，宗觀字朗屋，善樂府歌詩，以王伯之略自許，時號「山陰二朗」。先生遭亂，散千金結客，坐繫獄，論死。宗觀號呼於所知，斂重貲，賄獄吏，得不死。既而論釋，宗觀聞之，大喜踴躍，夜渡江馳見先生，未至，為盜所殺。先生既免繫，放蕩江湖間，至歸安，得好友二人，其一自慈谿遷於歸安者也，自是每出則三人俱。至長洲，交陳三島，已交予里中，交祁班孫于梅市，後先凡六人。<sup>34</sup>

朱士稚，字朗詣，與同里張宗觀字朗屋者為莫逆交，二人並稱「山陰二朗」，此張宗觀即張近道<sup>35</sup>。朱士稚曾下獄論死，因張宗觀營救而得免，而宗觀竟先為盜所殺。後來朱士稚浪遊至歸安，又與好友二人密切過從，此「二人」即魏耕與錢纘曾，朱彝尊此文因作於通海案後，故避諱二人姓名。另外，朱士稚友人之一的陳三島(1623-1659)<sup>36</sup>，字鶴客，亦慷慨志士，三島有〈錢瞻百招飲蓮花莊〉<sup>37</sup>一詩，知其亦曾到過歸安，並參與了蓮花莊社集。對照錢价人《今詩粹·凡例》云：「是刻余與魏子遴次數月而就，大約魏子之勞居十七，余纔十二。此外，惟朱子朗詣間過從商酌數首。」<sup>38</sup>又錢价人評張慤詩云：「洮侯舊集散失而新集未

<sup>33</sup> 同前註，頁 936-937。

<sup>34</sup> [清]朱彝尊：《曝書亭集》（臺北：世界書局，1989年），下冊，卷 72，頁 828。

<sup>35</sup> 張宗觀，一名近道，字用賓，一字朗屋。傳見[清]徐鼎撰，徐承禮補遺：《小腆紀傳》，卷 58，收入《清代傳記叢刊》（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第 69 冊，頁 659。

<sup>36</sup> 傳見同前註，頁 644。

<sup>37</sup> 魏耕、[清]錢价人編：《今詩粹》（清初刊本，臺灣大學圖書館藏），卷 10，頁 16b-17a。

<sup>38</sup> 同前註，凡例頁 3a。

得，是以此選缺如。昨鶴客來，聞多奇製，會俟二選盡攜致之，以供同好。」<sup>39</sup>可知朱士稚曾與魏耕、錢价人商討《今詩粹》的編輯，陳三島也曾與錢价人論張慤詩，根據這些線索，可判斷朱士稚、陳三島亦屬孚社成員。惟陳三島卒於順治十六年(1659)，朱士稚卒於順治十七年(1660)<sup>40</sup>，故二人並未捲入後來的通海案中。

再又，錢价人之弟虞仲、方叔、丹季亦以詩名，三人無疑也加入了其兄所領導的孚社。魏耕於《今詩粹》中論曰：

虞仲英姿磊砢，皎皎若仙，不媿王、謝家風。嘗與其兄瞻百，弟方叔、丹季刻燭聯句，予以「四皇甫」目之。<sup>41</sup>

嘉靖間吳中文士皇甫冲(1490-1558)、皇甫濬(1497-1546)、皇甫汈(1498-1583)、皇甫濂(1508-1564)四兄弟並好學工詩，時稱「皇甫四傑」<sup>42</sup>；錢氏兄弟四人刻燭聯句，同樣負有詩才，故魏耕以「四皇甫」喻之。魏耕〈洗硯池醉歌送朱士曾歸山陰〉一詩中並有「座間詞客四皇甫」之句，語下自注：「謂錢价人、志熙、志焯、志燾昆季。」<sup>43</sup>可知錢价人二弟名志熙，字虞仲；三弟名志焯，字方叔；四弟名志燾，字丹季。通海案發生後，錢价人諸弟皆受株連，遣戍寧古塔，三人曾與張縉彥(1599-1670)、吳兆騫(1631-1684)、姚其章、錢威等流放詩人共結「七子詩會」於戍地，後來錢志熙卒於塞外，錢志焯及錢志燾則逃歸南方<sup>44</sup>。

以上從活動場域、結社宗旨、社團成員等方面呈現了孚社的基本樣貌，最後再略述孚社與西泠派詩人之間的交往。吳偉業曾以「龍眠、西陵，繼雲間而作者也」來勉勵孚社諸子，事實上，孚社的根據地在湖州，以「西泠十子」為主體的登樓社活動於杭州，湖、杭二府毗鄰，兩社成員本即聲氣相通。例如李文達〈丁酉長至後二日湖舫雅集全魏雪竇錢瞻百朱朗詣柴虎臣孫宇台毛馳黃錢允武陸左城徐武令諸子分韻〉一詩云：

六琯飛灰日漸長，樓船湖上汎斜陽；清歌聲拂梅花落，舞袖筵隨鴻雁翔。

<sup>39</sup> 同前註，卷8，頁35a。張慤，後改名彥之，字洮侯，江蘇華亭人。

<sup>40</sup> 二人之卒年均依據〈貞毅先生墓表〉。

<sup>41</sup> 魏耕、錢价人編：《今詩粹》，卷6，頁53a。

<sup>42</sup> 參張廷玉等：《明史》，第24冊，卷287〈文苑三〉，頁7373-7374。

<sup>43</sup> 魏耕：《雪翁詩集》，卷5，頁85。

<sup>44</sup> 錢志熙兄弟流放寧古塔後的經歷，參楊鳳苞：〈錢瞻百河涓間集選序〉，《秋室集》，卷1，頁10a。另參李興盛：〈吳兆騫交遊考〉，《江南才子塞北名人吳兆騫年譜》（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292-294。

擁妓何人簪瑇瑁？揮毫幾個對滄浪；中流四顧烟波渺，無那黃冠憶故鄉。<sup>45</sup>李文達，字兼汝，浙江蕭山人，與孚社諸子過從甚密，通海案後亦遭流放寧古塔<sup>46</sup>。此詩記錄了順治十四年（丁酉，1657）冬至後二日，湖、杭二府文人的一次集會，與會者中，魏耕、錢价人、朱士稚、錢纘曾為孚社才俊；柴紹炳（虎臣，1616-1670）、孫治（字台，1618-1682）、毛先舒（馳黃，1620-1688）、陸埜（左城）、徐汾（武令）為西泠菁英<sup>47</sup>。詩中述及，在六律之瑄葭灰飛動的冬至過後<sup>48</sup>，陰極陽生，白晝逐漸增長，此時兩地詩人共聚於湖上樓船，欣賞清歌曼舞，或擁妓，或揮毫，陶醉在詩酒風流的一片歡樂中；詩作結尾的氣氛則急轉直下，樂極而悲，面對著煙波浩渺，詩人化用杜甫「黃冠歸故鄉」<sup>49</sup>之句，表達了前朝遺民對於故國山川的追憶。由此推想，孚社與西泠諸子的互動除了詩文酬唱之外，當亦包含了遺民志節的砥礪。而其中，魏耕與孫治的關係尤值得注意，魏耕有〈鴛鴦湖別孫處士治〉、〈再過錢塘孫治〉二詩<sup>50</sup>，從中可見二人情誼之深厚，再據《慈谿縣志·魏耕傳》記載：「先生一女，適仁和庠生孫宇台之子某，亦庠生，葬先生及子於清波門外西湖之山麓。」<sup>51</sup>魏耕之女所適者，為孫治次子孫孝梅（1652-1673），孫治〈哭次兒孝梅文〉云：「為撫魏女出于九死之中，配為夫婦，兩家之祀，皆在爾躬。」<sup>52</sup>即記其兒與魏女婚配並祭葬魏耕之事。孚社與西泠詩人之間的交誼，也見證了動盪時代中明遺民命運的緊密連繫。

<sup>45</sup> 魏耕、錢价人編：《今詩粹》，卷11，頁18a。

<sup>46</sup> 傳見楊賓：〈祁奕喜李兼汝合傳〉，《楊大瓢先生雜文殘稿》，頁27。

<sup>47</sup> 柴紹炳、孫治、毛先舒列名「西泠十子」，陸埜為西泠派領袖陸圻之弟，徐汾為浙江仁和人，亦可歸入西泠派。

<sup>48</sup> 杜甫〈小至〉：「吹葭六琯動飛灰。」仇兆鰲注：「以葭葦灰實律管，候至則灰飛管通。冬至之律，為黃鐘也。葭，蘆也。琯以玉為之，凡十有二。六琯，舉律以該呂也。」〔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註》（臺北：里仁書局，1980年），第3冊，卷18，頁1567。

<sup>49</sup> 杜甫〈遣興五首〉其四：「上疏乞骸骨，黃冠歸故鄉。」同前註，卷7，頁564。

<sup>50</sup> 魏耕：《雪翁詩集》，卷3，頁43、卷10，頁149。

<sup>51</sup> 〔清〕馮可鏞修，〔清〕楊泰亨纂：《慈谿縣志》（三）（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影印光緒二十五年刊本），卷30〈列傳七〉，頁37a。縣志傳文註記此語出自「霞傳」，但與附錄於《雪翁詩集》的魏霞〈明處士雪實先生傳〉相照，二處文字不同。

<sup>52</sup> 〔清〕孫治：《孫宇台集》（《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149冊），卷26，頁6b。

### 三、孚社詩人的生命追尋

前節所述的孚社成員可以區分為兩種身分：一為蓮花莊主人，即錢价人、錢志熙、錢志焯、錢志燾兄弟；一為蓮花莊賓客，即魏耕、錢纘曾、朱士稚、陳三島。兩種身分的成員中，可分別以錢价人、魏耕為代表，本節即以二人詩作為例，說明孚社詩人如何追尋個人生命的存在意義。

孚社諸子為心懷故國、力圖匡復的豪傑之士，其中，又以魏耕的復國意識表現得最為強烈。魏耕為崇禎間諸生，雖未曾仕於明朝，但在易代後卻也以前朝遺臣自居，嘗云：「予雖在草莽，亦君臣也。」<sup>53</sup>又云：「吾束髮讀書，蒙朝廷恩澤，兼祖宗以還，世有顯人，為清白吏，不願屈跡虜庭，自甘窮餓。」<sup>54</sup>在魏耕的認知中，一介生員食國家餼廩，即算蒙受朝廷恩澤，君臣關係在此已經建立；再加上魏耕的先祖曾經為吏，使得此君臣之義融入孝道的意涵，因而更具有不可逾越的神聖性。在此一心理背景之下，堅守民族氣節的魏耕即使窮餓也不願屈服於新朝，其心中所念念不忘的，自然是存在於記憶中的大明故國。試看下列兩首詩作：

〈萬曆〉：

至今思萬曆，父老淚潸然；氣象黃虞合，華夷日月懸。  
雲門天上奏，諫鼓殿前傳；專用張丞相，垂裳四十年。<sup>55</sup>

〈歷歷〉：

歷歷崇禎始，星辰護紫薇；園丘祀白馬，中殿拱朱衣。  
烽燧西傳淺，駱駝南牧稀；京華全盛日，草木藹餘輝。<sup>56</sup>

萬曆後期至崇禎為晚明衰世，但在詩人親身經歷以及自我想像的交織之下，二朝卻變成了垂衣而治、京華全盛的太平年代。於此，不難感受到魏耕忠於故國故君的一腔熱血。而魏耕對於故國的追憶並不只是憑弔過往而已，兩首詩作中所勾劃的政治圖像，同時也是詩人試圖藉由軍事行動而恢復的國家盛世。〈抽戈〉一詩中，魏耕即述說了自己參與武裝抗清的心境：

十載烏號淚，至今曾不乾；青梧凋晚日，丹桂老秋天。

<sup>53</sup> 魏霞：〈明處士雪竇先生傳〉，頁196。

<sup>54</sup> 魏耕：〈歲暮遠游與嶠嶠二稚子有序〉，同前註，卷1，頁15。

<sup>55</sup> 同前註，卷7，頁110。

<sup>56</sup> 同前註，頁112。

妖氛何滾滾，鼙鼓正淵淵；麟閣誰人上？抽戈拓舊邊。<sup>57</sup>

明亡十載，詩人依然淚水未乾，值此妖氛正熾、伐鼓已響，中興事業依然大有可為之際，節操如青梧丹桂的志士，渴望的是能抽戈殺敵，收復失土，為國家立下汗馬功勞。正是懷抱此一理想，魏耕奔走於大江南北，積極投身於反清復明的運動，終至於壯烈犧牲。

至於錢价人，因其作品不易得見，其遺民志節向來無人道及。考《國朝湖州詩錄》選錄錢价人詩作二十餘首，其中第一首〈即事〉乃針對順治十六年(1659)鄭成功北伐之事表達感懷，詩云：

海水昔清淺，六鼉失瑤流；后羿無長繳，不堪落旄頭。  
 大鵬徙南冥，歷紀窮海陬；父老私雨泣，悲歌終夜稠。  
 何期大火時，艨艟下滄洲；強弩射洪潮，組練若雲浮。  
 前驅朱雀航，勢壓九江湫；赫如東旭出，紅雲滿神州。  
 惜哉旅力愆，吾衰不夢周；慷慨發長嘯，思從群公游。  
 灌莽動微涼，西風起長楸；朱實欲潛隕，繁英不可留。  
 庶勗勤令圖，毋為肉食謀。<sup>58</sup>

詩作開端先借龍伯國大人釣走六鼉，使得岱輿、員嶠二山沉於大海的神話<sup>59</sup>，點出明室傾亡的史實；並以后羿欠缺長繳，無法射落胡星旄頭為喻<sup>60</sup>，感歎明朝君臣無力阻擋清兵的南下。接著寫國變之後，明朝政權如大鵬徙往南方海陬，中原父老泣如雨下，終夜悲歌；直到鄭成功率領水師北伐，一時兵甲雲浮，軍容壯盛，才為神州的光復帶來一線希望。可惜此一戰役終因旅力愆而功虧一簣，此處所謂「旅力愆」<sup>61</sup>，可視為雙關語，一方面是錢价人惋惜鄭成功的軍旅後繼乏力，以致於兵敗金陵；另一方面則是錢价人自歎膂力已衰，無法扭轉乾坤，正扣合下句的「吾衰不夢周」。此金陵之役雖然未能一舉扭轉乾坤，但錢价人仍慷慨

<sup>57</sup> 同前註，頁 98。

<sup>58</sup> 陳焯編：《國朝湖州詩錄》，卷 2，頁 1a-b。

<sup>59</sup> [晉]張湛注，楊伯峻集釋：《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1 年），卷 5〈湯問篇〉，頁 151-155。

<sup>60</sup> 「旄頭」，或作「髦頭」。《史記·天官書》：「昂曰髦頭，胡星也。」見[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第 4 冊，卷 27，頁 1305。

<sup>61</sup> 語出《尚書·秦誓》：「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題[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正義：《尚書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 年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本），卷 20，頁 12b-13a。

長嘯於西風中，與群公相互勉勵：即使故國如朱實隕落，如繁英凋零，仍應努力策劃更爲完善的復國之計，勿讓肉食者輕易謀取了大好江山。由此詩觀之，錢价人的復明理想與魏耕並無二致，而《國朝湖州詩錄》將此詩編排於錢价人詩作的第一首，當亦隱含表彰其忠義節操之意。

在乎社諸子匡復故國的生命追尋中，「雲遊」與「結社」成爲他們最基本的生活樣態。魏耕於國亡後經常雲遊四方，嘗有詩：

〈醉歌行〉：

明州布衣家已傾，幾歲亡命乞餘生；襤褸百結脚不襪，伶仃枯槁無人形。  
奔走東吳與西楚，滿城盡是商與賈；各自全軀保妻子，搥胸何處訴愁苦？<sup>62</sup>

〈題顧樵山水圖歌行〉：

二十年來事飄宕，雞鳴駕車暮五兩；功名蹉跎仙不成，襟期騷屑色沮喪。<sup>63</sup>

〈丙申夏以事之山陰客祁生班孫宅其伯淨超毗耶居士後身也他日邀余游密園宴飲因爲醉歌〉：

我欲溯流上荊襄，自傷枯槁已暮齒；飄零會寫千首詩，潦倒終當付泥滓。<sup>64</sup>

〈發揚子〉：

華髮經年事遠游，征帆疊鼓下揚州；江迴春漲峨眉雪，地轉濤鳴三峽流。<sup>65</sup>  
奔東吳，走西楚；上荊襄，下揚州；或駕車，或行船；伶仃枯槁，騷屑沮喪。浪跡天涯海角的魏耕，以詩作反覆述說著不知歸根何處的飄泊感，這其實也是亡國遺民共同的心靈感受。而明遺民的雲遊，除了自我放逐以宣洩家國破亡的悲憤之外，往往也具有考察山川形勢、聯絡反清勢力以圖謀復國的積極意義<sup>66</sup>，魏耕的飄宕亦應作如是觀。〈越中述懷贈拾殘上人還長沙〉一詩中，魏耕自道：「流浪已云久，東西總類狂；會稽雖暫住，魏闕那能忘！」<sup>67</sup>即說明自己的流浪是因爲心存魏闕。更值得注意的是〈仲冬游商太傅土城山園亭山爲勾踐夫人教西施歌舞處一名西施山其令孫徵說邀同吳二卿禎攜酒饌過之時予已別錢六輩解維三日矣醉

<sup>62</sup> 魏耕：《雪翁詩集》，卷4，頁57。

<sup>63</sup> 同前註，卷5，頁78。

<sup>64</sup> 同前註，頁83-84。

<sup>65</sup> 同前註，卷9，頁126。

<sup>66</sup> 明遺民之雲遊所具有的多重意涵，可參孔定芳：〈清初明遺民的「雲遊」行爲及其意蘊〉，《人文雜誌》2005年第3期，頁112-119。

<sup>67</sup> 魏耕：《雪翁詩集》，卷11，頁162。

後悵然題其石壁》一詩：

嗟予憔悴江潭裏，歲歲行吟無日已；猶如一葉墮飄風，繞枝三匝鳥欲起。  
故人幾輩意氣同，昨日當筵今日空；迎船忽倒二子屣，相邀誤入館娃宮。  
璇題璧月映流水，重樓複閣帶垂虹；曾聞太傅攜雙妓，清歌停裊畫梁中。  
春來處處飛黃鳥，檻前啼落桃花紅；佳境偶攀心所愛，美酒如淮更堪對。  
見月弄影影徘徊，狂奴還發故時態；榜人催罷歸去來，將從豪聖徧九垓。  
倘得功成竟長揖，復訪山陰人姓梅。<sup>68</sup>

此詩詩題頗長，恰為詩歌的寫作背景作了詳細說明。某年仲冬，宛如風中飄零之葉、無枝可棲之鳥的魏耕，再度解纜啓程，展開另一次的飄泊。途中，因明吏部尚書商周祚之孫商徵說以及友人吳卿禎的邀請<sup>69</sup>，魏耕造訪了商周祚位於會稽土城山的園亭。土城山一名西施山，據云為勾踐夫人教西施歌舞處，則此地不僅饒富園林之勝，同時也充滿了復國的文化內蘊與歷史想像。在一番清賞以及醉酒弄影之後，船夫催促著魏耕登船，魏耕於是趁著酒意題詩於石壁，明白宣示：此去將遍訪天下豪聖，共商復明之計，待完成使命後，則將長揖身退，復訪如漢代梅福<sup>70</sup>一般隱居於山陰的友人。由此可證，魏耕的雲遊正是復國理想一種實踐。

坐擁蓮花莊的錢价人雖有安適的居所，但同樣頗事遠遊。魏耕有〈送錢价人章金牧之燕兼寄姜侍御圖南〉<sup>71</sup>一詩，即寫送錢价人北赴燕都之事，錢价人在〈燕邸雜詩〉<sup>72</sup>中，也記錄了行旅京師的見聞與感懷。除北遊燕京之外，錢价人還曾旅居河渭之間，〈河渭間戲題〉云：「家居河渭間，清渭日潺潺；君看清渭去，常帶濁河還。」<sup>73</sup>正因為一度以此地為家，故其詩集即命名為《河渭間集選》。更能顯示錢价人行遊蹤跡的作品則是組詩〈北征雜詩〉<sup>74</sup>，其中詩句如

<sup>68</sup> 同前註，卷 6，頁 94。浙江古籍出版社點校本詩題闕誤，今據《四明叢書》本校改，見魏耕：《雪翁詩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 年《四明叢書》，第 2 集第 5 冊），卷 6，頁 6a-b。詩題之錢六，指錢霍，字去病，浙江山陰人。

<sup>69</sup> 商周祚，字明兼，浙江會稽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官至吏部尚書。周祚之孫徵說，字兩臣。吳卿禎，字云章，浙江山陰人。

<sup>70</sup> 梅福於王莽專政後，棄妻子，變名姓，隱於會稽間。〔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第 9 冊，卷 67〈楊胡朱梅云傳〉，頁 2927。

<sup>71</sup> 詩見魏耕：《雪翁詩集》，卷 10，頁 136-137。章金牧（?-1672），字雲李，浙江德清人。姜圖南（1620-?），字真源，浙江山陰人，順治六年進士。

<sup>72</sup> 《同岑集》錄錢价人〈燕邸雜詩〉三首，《國朝湖州詩錄》錄錢价人〈燕邸雜詩〉二首，其中一首重出，共得四首。

<sup>73</sup> 陳焯編：《國朝湖州詩錄》，卷 2，頁 6b。

<sup>74</sup> 《同岑集》錄錢价人〈北征雜詩〉五首，《國朝湖州詩錄》亦錄錢价人〈北征雜詩〉五

「木落陪京見，江寒北固陰」、「煙起荊門紫，天空鄒嶧清」、「古廟長征馬，荒原陳寶雞」、「黃河歸冀北，鉅野溢流漸」<sup>75</sup>，一連串的地名，鋪陳出故國山川的壯麗圖像，足見錢价人遊歷範圍之廣。再從動機和目的來作分析，又可知錢价人的雲遊同樣是爲了體現明遺民的志節，試看〈北征雜詩〉其中兩首：

蹈海悲無策，飄零戎馬中；孤城塵匝地，小艇雨連空。  
大陸迤齊魯，漳河下會通；祖生初北渡，投策意何雄！  
江關哀庾信，羈旅泣徐陵；塵起朝隨馬，憂來夕飲冰。  
投淵猶未遂，抱石恥無能；卻笑遼東帽，還誇似管寧。<sup>76</sup>

第一首詩中，錢价人坦言自己無法蹈海殉國，只能將生命寄託在戎馬飄零之中，「戎馬」二字，說明了其雲遊實帶有策劃軍事行動的意義。三、四句寫塵中孤城、雨中小艇，固然是旅途所見之景，同時也象徵著遺民生命的孤絕與渺小。孤絕渺小的生命依然是真實的存在，在考察了齊魯大地的形勢以及漳河注入會通河的流向後，詩人不禁興起祖逖渡江時中流擊楫的豪情，而祖逖當時的誓言：「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sup>77</sup>正可說明錢价人堅定的復國信念。第二首詩中，錢价人再度以未能抱石投淵爲恥，並以庾信哀於江關、徐陵泣於羈旅爲喻，表明去國懷鄉的孤苦心境。朝起則行馬，夕來則飲冰，在浪遊的歲月中，焦灼不安的錢价人仍日夜以復國之事爲憂。詩末，對於自誇爲管寧<sup>78</sup>卻毫無積極作爲的前朝遺民，錢价人以「卻笑」二字評之，正意味著其所懷抱的遺民情志，絕不止於隱遯棲逸而已。

當然，浪跡天涯的氣節之士，也需要落腳停泊的聯絡站，以利於復國大計的推動，祁理孫(1627-1687)、祁班孫(1632-1673)兄弟位於山陰的曠園與寓山園，以及錢价人位於歸安的蓮花莊，即是魏耕、錢纘曾、朱士稚、陳三島等人最常駐足的地方，遺民結社就在這些群聚場合中應運而生。明遺民的結社雖然具有政治

---

首，其中兩首重出，共得八首。

<sup>75</sup> 前三聯見〔清〕李夏器編：《同岑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年《叢書集成續編》，第116冊），卷4，頁16b-17a；末聯見陳焯編：《國朝湖州詩錄》，卷2，頁5b。李夏器，字不器，浙江長興人。

<sup>76</sup> 陳焯編：《國朝湖州詩錄》，卷2，頁5b-6a。

<sup>77</sup> 〔唐〕房玄齡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第6冊，卷62〈祖逖傳〉，頁1695。

<sup>78</sup> 漢末管寧避亂遼東，拒絕曹魏徵聘，常著皂帽、布襦袴、布裙。〔晉〕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第2冊，卷11《魏書·袁張涼國田王邴管傳》，頁354-360。



性的目的，但同時也為前朝的孤臣孽子提供心靈休憩的處所，讓他們可以暫時卸下沉重的生命負擔，與同道之士詩酒唱和、讀書論學。例如魏耕〈題祁五弟理孫藏書東樓〉一詩云：

東樓雄雄何壯哉！側遶鑑湖水滌迴；鑑湖澄淨漾碧玉，登樓縹緲天際來。  
朝嵐夕翠紛光彩，賀監風流千年在；敕賜曾傳臺沼榮，豪華南壓紫泥海。  
祁家冠蓋宇內聞，卻於此地藏典墳。……

我生落魄多遠游，校讎常到文選樓。公子肯著離騷賦，一絨尚慰羈人愁。<sup>79</sup>  
理孫、班孫為祁承燦(1563-1628)之孫、祁彪佳(1602-1645)之子。據全祖望(1705-1755)〈曠亭記〉記載：「山陰祁忠敏公之尊人少參夷度先生，治曠園於梅里，有淡生堂，其藏書之庫也；有曠亭，則遊息之所也；有東書堂，其讀書之所也。……吾鄉雪竇山人與公子班孫兄弟善，時時居此園。」<sup>80</sup>可知魏耕與祁氏兄弟的聚會是以曠園為主要場所，藏書東樓當在園中。此詩由藏書東樓的地理位置、風光景物、歷史掌故逐一說起，詩末則特別感銘祁理孫的垂青，使得落魄遠遊的羈人有幸於此樓讀書校讎，讓不安的靈魂得到了暫時的慰藉。曠園之外，魏耕也曾數度遊覽祁彪佳構築的寓山園，〈寓山園亭〉、〈八月十四日夜寓山宴集〉、〈重游祁中丞寓山園莊〉<sup>81</sup>諸詩皆記其事。即在聚會於祁氏別業期間，魏耕曾與錢纘曾、朱士稚共同選評當代吳越詩人之作，輯為《吳越詩選》<sup>82</sup>一書，此書正可視為曠園及寓山園社集所完成的詩學論著。

寓居歸安與錢价人等人交接時，魏耕也曾透露對於恬淡生活的渴望，如〈新治思溪舍南小隱即事和錢价人作〉所云：

羈客越鄉愁，邱樊多所暱；迴船青溪口，見君有此宅。  
石路駢紆徐，蘭棹敞弘赫；竹樹澄湖陰，雲霞浮嶺色。  
我常下君榻，晞髮謀閒適；疇坐南軒南，今臥北窗北。

<sup>79</sup> 魏耕：《雪翁詩集》，卷5，頁74。賀監，即賀知章，唐玄宗曾賜其鏡湖剡川一曲。〔宋〕歐陽修、宋祁等：《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第18冊，卷196〈隱逸〉，頁5606-5607。紫泥海，意謂仙境，傳說東方朔幼時曾遊歷此地。題〔漢〕郭憲：《別國洞冥記》（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年《叢書集成續編》，第211冊），卷1，頁1a。

<sup>80</sup> 全祖望著，朱鑄禹彙校集注：《結埼亭外編》，卷20，《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中冊，頁1133-1134。

<sup>81</sup> 魏耕：《雪翁詩集》，卷5，頁82、卷7，頁114、卷9，頁126。

<sup>82</sup> 《吳越詩選》二十二卷，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關於此書的介紹，可參黃裳：《來燕榭讀書記》（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下冊，頁341-343。

嚙嚙鳧聒晨，團團苔生夕；怡神風中琴，游衍彌自得。  
種瓜願所希，烹鼎恨何極；幸從潁水游，秉筆參圖籍。  
遐哉樂志論，仲統垂嘉則。<sup>83</sup>

魏耕於明亡後「乃挈妻子至蓮花莊」<sup>84</sup>，順治十六年(1659)時，又在錢价人思溪院舍之南修治竹素莊作為隱居之所<sup>85</sup>，實質上仍是寄人廡下。此詩述及，昔時常下榻於錢价人清幽的宅院，與之間適晞髮，坐對南軒；如今自己專屬的小隱既已築成，則當北窗下臥，與友人對望，晨聽鳧鳥聒鳴，暮看夕照苔上。詩中並以歷史典故為喻，說明此怡然自得的生活乃取法於召平種瓜<sup>86</sup>，而以酈食其慘遭烹鼎為戒<sup>87</sup>。這樣的生命情調，雖然轉入了平淡消沉，但卻是歷經滄桑的明遺民們內心另一種真實的聲音。詩作最後借仲長統〈樂志論〉作結，仲長統此文提到，願「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以「消搖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sup>88</sup>；魏耕在寫給錢价人的詩作中，同樣表達了「秉筆參圖籍」的願望。此點，則又反映出明遺民們在面對復國難成的挫折時，欲從立功轉向立言以尋求不朽的心理面向，《今詩粹》即在此一生命情境中被編纂成書。

#### 四、《今詩粹》的詩學立場

魏耕、錢价人合編的《今詩粹》共十五卷，選錄了五百餘位清初詩家的作品，全書依詩歌體裁而編排，各體依序為：樂府、五言古、七言古、五言律、七言律、五言排律、五言絕、七言絕。書中，魏耕評吳兆騫七言古詩時述及：「今秋朱朗詣從吳下來，得漢槎〈秋雁〉、〈春雪〉、〈白頭宮女〉、〈將赴

<sup>83</sup> 魏耕：《雪翁詩集》，卷3，頁42。

<sup>84</sup> 馮可鏞修，楊泰亨纂：《慈谿縣志》（三），卷30〈列傳七〉，頁36a。此語亦註明「霞傳」，但魏霞〈明處士雪竇先生傳〉仍無此語。

<sup>85</sup> 魏耕有〈己亥歲移居南陽竹素莊作〉一詩，己亥即順治十六年。見魏耕：《雪翁詩集》，卷3，頁52。

<sup>86</sup> 秦亡後，故秦東陵侯召平為布衣，種瓜於長安城東。見司馬遷：《史記》，第6冊，卷53〈蕭相國世家〉，頁2017。

<sup>87</sup> 酈食其為劉邦遊說齊王田廣，後遭齊王所烹。見同前註，第8冊，卷97〈酈生陸賈列傳〉，頁2693-2696。

<sup>88</sup> 語見〔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第6冊，卷49〈王充王符仲長統列傳〉，頁1644。

遼左〉諸作，悉悱惻不堪，搖曳愈甚。」<sup>89</sup>所舉朱士稚自吳地攜來的吳兆騫詩，皆〈西曹雜詩〉<sup>90</sup>中的作品，寫作當時吳兆騫因科場案而繫獄於刑部。其中〈將赴遼左〉一詩全題為〈閏三月朔日將赴遼左留別吳中諸故人〉，作於順治十六年(1659)閏三月，可推知魏耕所說的「今秋朗詣從吳下來」，指的是順治十六年秋天。此外，孚社諸子之一的陳三島卒於順治十六年，《今詩粹》選錄其詩時並未言三島辭世，更可確定其書之編成即在此年。後三年，魏耕與錢价人即因通海案而罹難。另觀錢价人《今詩粹·序》云：「至於漢、晉以來詩體源流，經緯諸論，畧詳於《古詩粹》諸選序中，故不復論。」<sup>91</sup>以及《今詩粹·凡例》云：「大抵其人歿在大樽前者，概不復錄，別入《盛明詩粹》選中。」<sup>92</sup>又知依錢价人原訂的計畫，是希望能通論歷代詩歌的源流發展，編選《古詩粹》、《盛明詩粹》、《今詩粹》一系列的詩歌選本，可惜因生命中突來的鉅變，使得此願無法實現，最後僅完成了《今詩粹》一書。

《今詩粹》基本的詩學立場在於取法唐代詩家，魏耕〈序〉中明白揭示：

余與錢子瞻百澄大雅之音，協和平之調，操繩以律士，而不敢稍溢於唐人。雖時代有殊，而天實生才不盡，苟操之有程，簡之得法，不使贗者亂真，則朱紫別而分數齊，格力嚴而繩削正。<sup>93</sup>

依魏耕、錢价人的審美眼光，唐代詩歌可作為大雅之音、和平之調的楷式，故二人分辨當代詩歌之朱紫真偽時「不敢稍溢於唐人」。楊鳳苞〈錢瞻百河渭間集選序〉說錢价人「斤斤守唐法」，意即在此。如此的選詩標準，實承襲了明代復古派的詩學觀念，不過，在前、後七子的復古論述中，七言古詩及律、絕諸體固當學習盛唐詩作，但五言古詩卻應以漢魏為正。李夢陽(1472-1529)即云：「夫五言者，不祖漢則祖魏，固也。」<sup>94</sup>何景明(1483-1521)也說自己學詩時：「古作必從漢魏求之。」<sup>95</sup>王世貞主張的涵泳範圍較廣，但也認為：「詩自

<sup>89</sup> 魏耕、錢价人編：《今詩粹》，卷6，頁6b。

<sup>90</sup> [清]吳兆騫撰，麻守中校點：《秋笳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卷4，頁129-149。

<sup>91</sup> 魏耕、錢价人編：《今詩粹》，錢序頁7b。

<sup>92</sup> 同前註，凡例頁2a。

<sup>93</sup> 同前註，魏序頁5b-6a。

<sup>94</sup> [明]李夢陽：〈刻陸謝詩序〉，《空同先生集》（臺北：偉文圖書出版社，1976年），第4冊，卷49，頁1424。

<sup>95</sup> [明]何景明撰，李淑毅等點校：〈海叟集序〉，《何大復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卷34，頁595。

〈風〉、〈雅〉外，當以〈古詩十九〉及建安三曹爲準。」<sup>96</sup>更值得注意的是李攀龍(1514-1570)〈選唐詩序〉的說法：

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陳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弗取也。<sup>97</sup>

此處，更直接將唐代五古排除在古詩的取法對象之外，唐代五古既不可取，則所當追躡者同樣在於漢魏。李攀龍此論引起了後來詩論家的熱烈討論<sup>98</sup>，但大體而言，漢魏古詩的典範性高於唐代五古，始終是明代復古論者的共同信念。對照之下，魏耕、錢价人「不敢稍溢於唐人」的說法顯然已在復古詩學的傳承中產生了若干變異，而魏、錢二子欲穩固其詩學立場，首先必須解釋的即是：唐代五古何以能取代漢魏古詩而取得正宗的地位？

對此，魏耕和錢价人在《今詩粹》中都曾提出說明。先看錢价人之說：

自于鱗「唐無五言古」之論出，而作者多優孟漢魏，掇取成語；或規摹大謝，神韻索然。雖大樽亦循此論，雲間、西陵並祖述之。余於是選，寧取唐調，擇其開闔排宕、韻致悠揚者。至句調，必仍取近古，稍涉時蹊不敢存也。<sup>99</sup>

論中並不否定漢魏古詩的藝術成就，事實上，漢魏古詩渾然天成、委婉蘊藉的美感特質本無容否定。錢价人所不滿處，在於明人受李攀龍「唐無五言古」的說法影響太深，創作時或優孟漢魏，或規摹大謝，習染既久，遂成格套；甚至到了明末清初的雲間派、西泠派，也仍然沿此餘波。爲了扭轉此一詩學趨向，錢价人擇取今人五古之作時反而以唐調爲主，此蓋唐代五古「開闔排宕」的風格相較漢魏古詩，展現出新穎的詩歌體貌，況且，明人於此一領域涉獵未深，其中仍有相當廣大的空間可供當代詩人縱情馳騁。換言之，錢价人是以避故就新的審美觀來賦予唐代五古新的典範價值。魏耕的想法與錢价人接近，嘗云：「擬漢魏者，往往得貌而遺情。」又云：「近來學蘇李、〈十九〉諸體已爲厭調，蓋不得其神理，而徒雕飾藻績也。」<sup>100</sup>面對漢魏古詩的擬作已流於僵化的詩學困境，魏耕同樣主

<sup>96</sup> [明]王世貞：〈墨蹟跋·古選古隸〉，《弇州山人續稿》（臺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第15冊，卷165，頁4b。

<sup>97</sup> [明]李攀龍著，包敬第標校：《滄溟先生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卷15，頁377。

<sup>98</sup> 關於李攀龍此說的意義與迴響，詳參陳國球：〈李攀龍「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說的意義〉，《明代復古派唐詩論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106-168。

<sup>99</sup> 魏耕、錢价人編：《今詩粹》，卷2，頁1a。

<sup>100</sup> 分見同前註，卷2，頁26a、5a。

張將學習的對象轉移至唐代，以尋求通變的可能。觀其評祁班孫五古曰：

奕喜向擬漢魏，繼進以太白，近日於孟襄陽、王輞川之間，得其深味，而於孟尤自有心獲。落語必俊，選境必永，造事輕淺，而轉眼卻深，真由妙悟得來。若不讀此一種詩，幾為「唐無古詩」一言所誤，予向不然其論，而苦無人得其深妙，以杜邪妄之談。今嘉禾則有朱子蓉在，山陰有奕喜，斯道可為不孤矣。<sup>101</sup>

祁班孫的五古原本亦擬漢魏，次則轉進至李白、孟浩然、王維諸家，而於孟浩然詩尤有所契；論中還提到另一位詩人朱茂暉（子蓉，1626-？），魏耕評其五古曰：「昔人謂孟襄陽『學不為儒，務掇青藻』，又曰『一味妙悟而已』，唯子蓉可以當之。」<sup>102</sup>可知朱茂暉五古之作同樣也企及孟浩然詩的境界。祁、朱二家皆取法唐代五古而斐然有成者，故魏耕引二人為同道，藉以破除李攀龍「唐無五言古」之說，同時，唐代五古的正宗地位也就在祁班孫與朱茂暉的詩作中得到了實例的確認。

須注意者，所謂的「不敢稍溢於唐人」，只是強調詩學立場的概括性用語，並非精確的陳述。實際上，魏耕和錢价人在選評今人詩作時，對於鎔鑄漢魏六朝卻又能自出機杼的佳篇，同樣予以採擇。比如魏耕評董黃（1616-？）五古曰：「比蘇、李舊詠較爽較雄，大約是古詩二十首後，〈錄別〉中尋出蹊徑風調來。」錢价人評朱士稚五古曰：「朗詣詩藉子建之神骨，運明遠之風度，通體朗雋，超絕時人。」錢价人評韓純玉（1624-1702）樂府〈採桑〉一詩曰：「以齊、梁音節憑寄雅懷，屈靈均之寫怨，此為近之矣。」<sup>103</sup>諸例皆可為證，足見魏、錢二子的詩學視野實仍相當廣闊。再者，唐代詩家及流派眾多，亦非所有唐代詩人均足以為典型。以《今詩粹》中的評語來看，魏耕和錢价人對於五古、七古、五律、七律等各體詩作的典範作品，其實還有更進一步的界定，試看以下四則較具代表性的論述：

子美五古全破古法，語語澀硬，過為肆直，特乖比興。較之太白、浩然，

<sup>101</sup> 同前註，卷2，頁29a。朱茂暉，字子蓉，浙江嘉興人。

<sup>102</sup> 同前註，卷2，頁10b。「學不為儒，務掇青藻」，語見〔唐〕王士源：〈孟浩然集序〉，收入〔唐〕孟浩然著，徐鵬校注：《孟浩然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集序頁1；「青藻」，原作「菁藻」。「一味妙悟而已」，語見〔宋〕嚴羽著，郭紹虞校釋：《滄浪詩話校釋》（臺北：里仁書局，1987年），〈詩辨〉，頁12。

<sup>103</sup> 分見魏耕、錢价人編：《今詩粹》，卷3，頁8a、1a、卷1，頁52b。董黃，字律始，江蘇華亭人。韓純玉，字子籟，浙江歸安人。

不啻逕庭。但一篇之中往往古意不乏，與其學次山之俚率，又不如學子美。  
(魏耕評楊思聖五古)

七古一體，國朝惟北地、信陽獨擅妙矩，後如于鱗諸子，皆未得其解，故此體今日最難。自大樽獨尋墜緒，今時作者或宗初唐，或宗供奉，或宗浣花，雖風格各異，然皆彬彬可觀矣。  
(錢价人總論七古)

錫鬯少時，其五律悉祖初唐，以華秀爲宗。昨□□城歸，見其《南車遊草》，或分席少陵，或轉轡襄陽、輞川，蒼蒼鬱鬱，不可名狀。

(魏耕評朱彝尊五律)

七律雖僅八句，而開闔、起伏、淺深、疎密，變化無方。不深於初、盛唐家法，不能得其要也。大抵盛唐以高、岑、王、李爲至。

(錢价人總論七律)<sup>104</sup>

第一則評論述及，五言古詩固可學杜甫，但杜甫的五古澀硬肆直，遠不及李白與孟浩然，言下之意，當以李白、孟浩然爲最重要的師法對象。第二則評論言陳子龍獨尋七古之墜緒後，今時作者或宗初唐，或宗李白，或宗杜甫，均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則七古一體又當規仿初唐與李、杜。第三則評論雖專論朱彝尊五律，但論中所提到的初唐，以及杜甫、孟浩然、王維諸家，當足以作爲五律之準則。第四則評論總論七言律詩，同樣也以初、盛唐爲家法，盛唐詩人中，則推崇高適、岑參、王維、李頎爲最高造詣者<sup>105</sup>。以上四種詩歌體裁所標舉的家數雖然不一，但大抵集中於初、盛，而未及中、晚，《今詩粹》的詩學立場由此可得到更爲細緻的呈現。

魏耕、錢价人的正宗觀念雖與前、後七子不盡相同，但仍然是一種「格調」之說。而在清初的時空背景下，格調之論實已遭到性情論者的強烈質疑，例如黃宗羲(1610-1695)〈景州詩集序〉即曾對高棟(1350-1423)以降的明代聲調說提出批評，云：「夫詩以道性情，自高廷禮以來，主張聲調，而人之性情亡矣。」<sup>106</sup>

<sup>104</sup> 同前註，卷2，頁24b、卷5，頁1a、卷7，頁5b-6a、卷10，頁1a。第三則中有二字破損，無法辨識。

<sup>105</sup> 「盛唐以高、岑、王、李爲至」一語，並未明指「王、李」爲何人，但以盛唐詩人的七律來作判斷，當爲王維、李頎。例如《唐詩品彙》論盛唐七律云：「又如賈至、王維、岑參早朝倡和之什，當時各極其妙，王之眾作尤勝諸人。至於李頎、高適，當與並驅，未論先後。是皆足爲萬世程法。」即並論王維、岑參、李頎、高適諸家。〔明〕高棟編選：〈七言律詩敘目〉，《唐詩品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下冊，頁706。

<sup>106</sup> 〔清〕黃宗羲：《南雷詩文集》，《黃宗羲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0冊，頁15。

那麼，尊崇唐人音調的孚社詩人又該如何面對此類挑戰，以論證格調的講求並不致於扼殺詩人性情？其次，雲間詩派注重詩歌格調，力倡大雅之音，其目的在於以雅音興國，如陳子龍〈皇明詩選序〉所云：「二三子生於萬曆之季，而慨然志在刪述，追游、夏之業，約於正經，以維心術，豈曰能之？國家景運之隆，啓迪其意智耳。」<sup>107</sup>但隨著朝代的更迭，對於異族統治下的明遺民而言，促使「國家景運之隆」的詩學理想已失去了論述的著力點。在此一情境下，身為雲間詩派之後起者的孚社詩人，又該如何處理時代盛衰與詩歌格調之間的對應關係？這是《今詩粹》的編輯必須面對的兩個重要問題。

前述第一個問題，魏耕與錢价人所採取的策略是降低「格調」的規範性，僅將之視為詩歌的基本要素，而非單一的評價標準，以使合於體格聲調的作品，仍具有抒發情感的空間以及多樣風格的可能性。錢价人《今詩粹·序》云：

夫喜朱而惡紫，貴竹而賤絲者，好之偏也；謂朱紫玄黃之皆美，笙簧絲肉之盡調者，明於色與聲之正也。其繪事所不施與協律所不及者，則非偏也，凡明乎色與聲者皆如是也。……余與魏子間收坊刻，論而著之，大旨無間玄黃，無分絲竹，取其成乎色與聲而汰其未成者。<sup>108</sup>

繪事必有「色」，色不施則不成畫；協律必有「聲」，聲不和則不成樂。此處繪畫和音樂都是用來比喻詩歌，若參考李東陽(1447-1516)的說法：「詩必有具眼，亦必有具耳。眼主格，耳主聲。聞琴斷，知為第幾絃，此具耳也；月下隔窗辨五色線，此具眼也。費侍郎廷言嘗問作詩，予曰：『試取所未見詩，即能識其時代格調，十不失一，乃為有得。』」<sup>109</sup>則繪畫之「色」當如詩歌之「格」，音樂之「聲」當如詩歌之「調」，詩歌若無「格調」，則不成詩矣。所謂「格調」，意指詩歌的語言組織與音調抑揚之體式<sup>110</sup>，在《今詩粹》中，此一體式的主要準的雖在於初、盛唐，然亦兼採漢魏六朝，況且格調只是一首好詩的必要條件，而非全部的元素，因此，魏耕與錢价人選詩時，固然擇取成乎「聲色」的合格之作，但所錄詩作並「無間玄黃，無分絲竹」，亦即涵容了多元的情感樣態與

<sup>107</sup> [明]陳子龍：〈序〉，見陳子龍等編：《皇明詩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年），序頁3a。

<sup>108</sup> 魏耕、錢价人編：《今詩粹·序》，錢序頁3a-b、7a-b。

<sup>109</sup> [明]李東陽：《麓堂詩話》，收入《歷代詩話續編》（臺北：木鐸出版社，1988年），下冊，頁1371。

<sup>110</sup> 關於「格調」一詞的意涵，可參汪涌豪：《範疇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145-164。

詩歌風貌。在《雪翁詩集·自序》中，魏耕還曾指出：

苟無所爲而爲之，雖擬議盡變，曲肖曩篇，無疾呼痛，僞託可笑！故余之於詩，初無矜飾，務達其情。<sup>111</sup>

「擬議盡變，曲肖曩篇」，可謂深得古人格調，但此類篇章若欠缺情感內涵，依然是僞託可笑的作品。魏耕期許自己的詩歌「務達其情」，正意味著格調本不與性情互斥，反而必須與詩人之性情相輔相成，才能完成一首佳作。

至於前述第二個問題，通覽《今詩粹》全書，其中並無大雅之音爲盛世表徵一類的說法，時代與格調之間的關聯性在此完全被忽略。魏耕與錢价人所重視的，反而在於詩人人格與詩歌格調的合一，例如下列諸說：

用賓刻意摹古而才足以濟之，其胸中實有絕世孤憤，故慷慨悲歌，繁音促節，動與古會。（錢价人評張宗觀樂府）

蘊生忠節之士，其憂君愛國之心，固不減子美，而詩亦從浣花得法，故錯綜之中卻見古辣。（魏耕評黃淳耀五古）

黍字英爽自喜，讀其七古，醇雅作大唐之歌，然其骯髒處時露也。（魏耕評呂師濂七古）

文友五律有雄概，不專主初、盛，卻與初、盛無不合。

（錢价人評董以寧五律）<sup>112</sup>

諸例分別評論了張宗觀、黃淳耀(1605-1645)、呂師濂、董以寧(1629-1669)的詩作，我們可以參考四位詩人的傳記資料來檢視魏、錢二子的論點。張宗觀「善樂府歌詩，以王伯之略自許」<sup>113</sup>，其樂府刻意摹古，不僅合於古作音節，同時也展現出胸中的絕世孤憤；黃淳耀於清兵南下時死守嘉定城，城破後自縊殉國<sup>114</sup>，其五古得力於杜甫詩法，正與忠君憂國之心相印合；呂師濂「甲申後散財結客，好談兵，慕徐文長之爲人，徧歷九邊」<sup>115</sup>，蓋亦恢奇之士，其七古一方面得大唐之醇雅，一方面透露出高亢剛直的意氣；董以寧「性豪邁，慷慨不可一世」<sup>116</sup>，其

<sup>111</sup> 魏耕：〈自序〉，《雪翁詩集》，序頁5。

<sup>112</sup> 魏耕、錢价人編：《今詩粹》，卷1，頁12b、卷4，頁1a、卷6，頁14b、卷7，頁18a。

<sup>113</sup> 朱彝尊：〈貞毅先生墓表〉，頁828。

<sup>114</sup> 黃淳耀，字蘊生，江蘇嘉定人，崇禎十六年進士。傳見張廷玉等：《明史》，第24冊，卷282〈儒林一〉，頁7258。

<sup>115</sup> 徐世昌編：《晚晴移詩匯》（臺北：世界書局，1982年），卷17，頁21。呂師濂，字黍字，浙江山陰人。

<sup>116</sup> 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18冊，卷70〈文苑傳



五律與初、盛唐詩無不契合，詩人雄邁之氣概亦流貫於其中。在魏、錢二子的評語中，四位詩人的慷慨情思因能與詩歌體式適度配合，故可創作出動人的篇章，此一觀念可遙契於王世貞《藝苑卮言》所述：「才生思，思生調，調生格。思即才之用，調即思之境，格即調之界。」<sup>117</sup>意謂若能熟諳典範詩作的體格聲調，將可使此一詩歌語言的構成法度內化於創作主體的生命，使之成為詩人才思的展演。由此觀之，孚社詩人在清初的時空背景之下，已發展出有別於雲間詩派的格調論述，此一論述型態強調的是：作家應在時代的逆境中激發出高昂的人格，進而使精神意志融入相應的詩歌格調之中。

## 五、陳子龍的典範意義

前文提及，吳偉業曾勉勵孚社諸子「繼雲間而作」，符應於梅村的期許，《今詩粹》中最為推尊的當代作家正是陳子龍。錢价人〈凡例〉指出：

自數十年前，作者多學竟陵，字雕句別，以示新異。大樽先生獨宗濟南，力返大雅，風氣丕變，乃有雲間詩體之號。後來詩人，青過於藍，於盛唐諸家，爬羅剔抉，張皇幼眇，遂臻極盛。然要其始，實大樽摧廓之力也。故每體皆以大樽為首，誌風會之所自，非直以其志節行誼冠絕當時而已。至集中所載，皆並時之人。大抵其人歿在大樽前者，概不復錄，別入《盛明詩粹》選中。<sup>118</sup>

《今詩粹》編於順治十六年(1659)，距陳子龍殉節的順治四年(1647)已有十多年時間，就此點而論，陳子龍的身分似未盡符《今詩粹》選錄「並時之人」詩作的條件。但錢价人仍認為，選評當代詩歌必須以陳子龍為起點，理由有二：其一，就詩歌因素而言，陳子龍的作品上承後七子，改革了竟陵派的詩風，使得清初的詩歌創作得以重返於雅正傳統；其二，就詩人因素而言，陳子龍投身於復明運動而壯烈犧牲，「其志節行誼冠絕當時」，堪為今人之表率。合觀此兩點理由，可知錢价人實有意並舉陳子龍的詩格與人格，以宣揚孚社詩人的詩學理想與生命志向。

正因為奉陳子龍為當代詩人的準式，《今詩粹》的八種詩歌體裁均以陳子龍

一〉，頁5705。董以寧，字文友，江蘇武進人。

<sup>117</sup> 王世貞：《藝苑卮言》，卷1，收入《歷代詩話續編》，中冊，頁964。

<sup>118</sup> 魏耕、錢价人編：《今詩粹》，凡例頁1a-2a。

居首，其他詩家的作品附之於後，形式上相當特別。不僅如此，《今詩粹》的選詩數量也以陳子龍最多，茲將其書錄詩首數前十名的詩人表列如下：

詩人	樂府	五古	七古	五律	七律	五排	五絕	七絕	總計
陳子龍 臥子	8	10	8	15	14	3	1	2	61
朱士稚 朗詣	21	3	6	7	16				53
蔡仲光 大敬	11	20	1	10	3			2	47
吳兆騫 漢槎		7	5	13	14		1	1	41
錢 霍 去病		14	7	10	4		2	2	39
祁班孫 奕喜		13	4	3	15		4		39
沈 謙 去矜	3	8		10	11	2	1	3	38
毛奇齡 大可		3	2	12	18	2			37
范彤弧 樹鏹		13	6	11	3	2			35
朱茂暉 子蓉	3	5		13	1		6	6	34

由統計數字來看，陳子龍的作品入選六十一首，居所有詩人之冠，同時也是惟一兼備眾體的大家，其所具有的崇高地位於此尤清晰可見。以下即就詩歌與志節兩方面，進一步論析陳子龍在孚社詩人心目當中的典範意義。

先就詩歌成就而論。《今詩粹》所錄陳子龍詩雖然各體兼備，但五排、五絕、七絕等次要詩體選錄較少，並非重心所在，書中對於陳子龍典範意義的建構，主要仍集中於樂府及五七言古、律。試看以下評語：

大樽樂府，純乎初唐，然華瞻如列闕倒景，朱霞眩目。

（錢价人評陳子龍樂府）

大抵五古學漢魏者，轉關必在大謝，唐之曲江、本朝之空同皆是如此。今黃門復祖其說，質悶之間兼以峻秀，信是雅宗。

（魏耕評陳子龍五古）

大樽七古，大都原本初唐，而間出於諸家。至其華瞻流宕，逸致欲飛，則所獨絕也。

（錢价人評陳子龍七古）

臥子五律，句貼字穩，雖無峭拔之奇，自然秀色可餐。

（錢价人評陳子龍五律）

雲間七律多從豔入，潤以初唐。大樽味特深厚，而詞更娟秀。

（錢价人評陳子龍七律）<sup>119</sup>

<sup>119</sup> 同前註，卷1，頁1a-b、卷2，頁1a-b、卷5，頁1b、卷7，頁1a、卷10，頁1b。

陳子龍諸體詩作中，五言古詩係取法漢魏而轉關於謝靈運，此點與孚社詩人擇取唐調的立場不同；至於五律，《今詩粹》中並未標明淵源所自。其餘樂府、七古、七律三體，或「純乎初唐」，或「原本初唐」，或「潤以初唐」<sup>120</sup>，要皆具有「初唐」之風。此一論點頗具深意，蓋魏耕、錢价人論詩本篤守唐法，此處將陳子龍詩定位為初唐，一方面顯示陳子龍的作品具有開創時代新局的意義，另一方面也表明了當代詩人實接續陳子龍的初唐詩風而起，遂能風起雲湧，締造盛唐一般的詩歌榮景。這也就是《今詩粹·凡例》中所說的：「後來詩人，青過於藍，於盛唐諸家，爬羅剔抉，張皇幼眇，遂臻極盛。」錢价人於《今詩粹》正文開端也曾重複提及：「大樽當榛蕪之餘，力闢正始，一時宗尚，遂致羣才蔚起，多於弘、正之代，幾與盛唐比隆。摧廓振興之功，斯為極矣。」<sup>121</sup>所論意涵相同，再次賦予了陳子龍於清初詩壇上開疆闢土，引領風騷的重要位置。

前述評論中也分別指出陳子龍各體詩作的風格特色：大樽樂府及七古「華贍」、五古「峻秀」、五律有「秀色」、七律則文詞「娟秀」。這些評語確實能掌握住陳子龍詩的部分特質，不過，乾隆時期的朱琰卻在《明人詩鈔》中提出反對意見，論云：

臥子七言律秀絕寰區，乃其天姿清妙，故落墨高華，非翡翠蘭苕可比。或謂雲間派本以豔入，失其本來矣。<sup>122</sup>

對照前引《今詩粹》評語，可知朱琰此論係針對錢价人而發。其意以為，陳子龍的七言律詩不僅秀絕天下，更且清妙高華，有「鯨魚碧海」之氣魄，而非「翡翠蘭苕」之流可比，故對於雲間七律從豔而入的論點，評以「失其本來」。事實上，吳偉業已曾指出陳子龍詩「高華雄渾」<sup>123</sup>，王士禛(1634-1711)也說陳子龍七律「沉雄瑰麗」<sup>124</sup>，二人之說因能兼及陳子龍詩作的氣勢力度與文辭華彩，故成為後世描述陳子龍詩風的基本認識，朱琰的「高華」之說即源自於此。儘管如

<sup>120</sup> 「初唐」之論皆出自錢价人，魏耕並無此類說法。但《今詩粹》既經魏、錢二子商討而編成，故在廣義上，仍可視為二人的共同意見。

<sup>121</sup> 魏耕、錢价人編：《今詩粹》，卷1，頁1a。

<sup>122</sup> [清]朱琰編：《明人詩鈔》（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37冊），《正集》，卷12，頁18b。朱琰，字桐川，浙江海鹽人，乾隆三十一年進士。

<sup>123</sup> 吳偉業著，李學穎集評標校：《梅村詩話》，《吳梅村全集》，下冊，卷58，頁1135。

<sup>124</sup> [清]王士禛：《香祖筆記》，卷2，《王士禛全集》（濟南：齊魯書社，2007年），第6冊，頁4484。

此，朱琰對於錢价人的批評並未全是。我們仔細分析錢价人之論，所謂「多從豔入」，只是指出雲間七律的入手處，非指最終的完成；況且錢价人論中明言雲間七律「潤以初唐」，而以沈佺期、宋之問為代表的初唐七律，正具有高華雄偉的特質。例如胡應麟(1551-1602)《詩藪》云沈、宋七律「體裁明密，聲調高華」<sup>125</sup>，許學夷(1563-1633)《詩源辯體》亦云沈、宋及杜審言三公七律「體多整栗，語多雄偉」<sup>126</sup>，兩位明代後期的詩學大家即對初唐的七律風格作了準確的概括。再觀錢价人評李雯(1607-1647)七律云：「舒章設色偉麗，結體搖曳，直逼初唐。」<sup>127</sup>論中也以「偉麗」來連結初唐與雲間詩風，由此益可知，錢价人所謂的「多從豔入」而「潤以初唐」，已點出陳子龍詩雄偉壯麗的特質，並非純以豔體的角度而論，朱琰因忽略了「潤以初唐」之句，故未能體會錢价人評論的完整內涵。七律之外，錢价人謂大樽七古「華瞻流宕，逸致欲飛」，同樣認為陳子龍的七言古詩具有流動飛揚的豪情；再又魏耕謂黃門五古「峻秀」，也指出了其五言古詩於秀雅中帶有高峻的氣勢。整體而論，《今詩粹》對於陳子龍典範詩風的描述，雖有偏於豔麗之姿的傾向，但並未忽略其氣概沉雄一面。

次就人格志節而論。對於志圖匡復的孚社諸子來說，陳子龍值得景仰之處不僅在於詩歌上的表現，更在於以身殉國的忠義精神。錢价人〈存歿口號·其四〉是為陳子龍、徐孚遠(1599-1665)兩位雲間友人而作，詩中即讚揚了陳子龍的抗清壯舉，詩云：

臥子陳子龍雄才起義師，魯陽戈倒國場悲；閻公徐孚遠慷慨持周道，慟哭興元草制時。<sup>128</sup>

陳子龍於順治二年(1645)起義師於松江，兵敗後隱名遁去，至順治四年(1647)，又因涉入吳勝兆反正一案而被捕，於押解途中乘間赴水就義。對於陳子龍的復明之舉，錢价人詩反用「魯陽搃戈」<sup>129</sup>的典故來作比喻，意謂臥子雖欲挽回日薄西

<sup>125</sup> [明]胡應麟：《詩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內編〉，卷5，頁82。

<sup>126</sup> [明]許學夷著，杜維沫校點：《詩源辯體》（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卷13，頁147。

<sup>127</sup> 魏耕、錢价人編：《今詩粹》，卷10，頁11b。

<sup>128</sup> 陳焯編：《國朝湖州詩錄》，卷2，頁7a。「慟哭興元草制時」，似借唐德宗下興元詔罪己一事，代指明思宗留下御筆血詔而自縊身亡。

<sup>129</sup> 《淮南子·覽冥訓》：「魯陽公與韓構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搃之，日為之反三舍。」劉文典撰，馮逸、喬華點校：《淮南鴻烈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上冊，卷6，頁193。

山的故國，無奈干戈既倒，胸懷壯志的英雄也只能捐軀化爲國家的忠魂。此一典故的援引，透顯出陳子龍的抗清行動實充滿明知不可爲而爲之的悲壯精神，詩作於感慨中實寄託尊崇之意。參照陳子龍〈白日行〉云：「日車荒茫不可尋，夸父馳驅成鄧林。魯陽壯士亦無補，獨肯回翔留寸陰？」<sup>130</sup>知陳子龍也曾自喻爲魯陽壯士，藉以表達一己之力難以對抗天下大勢的傷感，錢价人詩殆沿襲其意耳。

《今詩粹》中，正收錄了〈白日行〉一詩，魏耕並評曰：

臥子少年所作，只能道狹斜風流等事。此其晚歲遺稿，有懷沙之冤，無迴鑿之力，故語語絛痛。<sup>131</sup>

「有懷沙之冤，無迴鑿之力」一語，不僅吻合了陳子龍晚年的行跡，同時也將其人格推向屈子般的高度。由此觀之，在孚社詩人的心目中，陳子龍矚然泥而不滓的志行當足與日月爭光。

除〈白日行〉外，《今詩粹》選錄的陳子龍詩亦多乙酉後所爲《焚餘草》中的作品<sup>132</sup>，這些詩作也反覆交織出陳子龍的忠貞形象。例如下列詩句：

〈朔風〉：

蘭茝在握，君子所媚；枯菀有時，芬芳不異。

〈平陵東〉：

污宮薦棘雖無成，天下始知稱漢兵；不逢時會豈失策？猶與宛雒開先聲。

〈古有所思行〉：

方壺岱輿落海底，珊瑚沉綠生交柯；乞得媧皇五色石，下土茫茫見深碧。

〈雜詩〉：

我行率曠野，側足自屏營；狗屠竟安往？瀨女誰見明？<sup>133</sup>

〈朔風〉詩中，陳子龍以蘭茝香草自喻<sup>134</sup>，蘭茝之枯榮有時，但芬芳的本質卻永不改變，象徵著詩人面對天地崩解的嚴酷考驗，依然堅持高潔清亮的品格。〈平

<sup>130</sup> 陳子龍著，施蟄存、馬祖熙標校：《陳子龍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卷10，頁297。

<sup>131</sup> 魏耕、錢价人編：《今詩粹》，卷1，頁3b。

<sup>132</sup> 《今詩粹》錄陳子龍詩共六十一首，按嚴詩作出處，則《湘真閣稿》九首、《雲間三子新詩合稿》二十八首、《焚餘草》二十四首。《焚餘草》的部分約佔總數之四成，因篇目較繁，故不一一臚列。

<sup>133</sup> 魏耕、錢价人編：《今詩粹》，卷1，頁1b、2b、3a、卷2，頁4a；陳子龍著，施蟄存、馬祖熙標校：《陳子龍詩集》，卷1，頁8、卷10，頁304、296、卷7，頁203。

<sup>134</sup> 屈原〈悲回風〉：「故荼薺不同畝兮，蘭茝幽而獨芳。」〔漢〕王逸章句，〔宋〕洪興祖補注：《楚辭補注》（臺北：漢京文化公司，1983年），卷4，頁156。

陵東〉寫的是漢代翟義起兵討伐王莽之事<sup>135</sup>，翟義的起事雖然無成，但卻為光武中興開啓了先聲，詩意喻指當時的抗清戰役雖遭逢挫敗，然成功不必在我，日後當更有繼起者奮勇完成復明的大業。〈古有所思行〉則藉方壺、岱輿的沉落比喻神州的淪亡<sup>136</sup>，此時，詩人仍渴望乞得女媧五色石以補天，勇赴國難的決心同樣表露無遺。〈雜詩〉中，徬徨於曠野的詩人再以「狗屠」、「瀨女」自訴心曲，「狗屠」意謂詩人之豪氣猶如聶政、荊軻一流之刺客<sup>137</sup>，將等待時機奮力一搏，誓死以報君國；「瀨女」則預告詩人的生命歸宿將如饋食於伍子胥的瀨水女子，投江自沉以表明忠貞節操<sup>138</sup>。此一類型的詩作在魏耕、錢价人的刻意擇取之下，確實能鮮明的散發出英雄志士的人格光輝。

爲了將陳子龍的人格典型更擴大爲普遍性的認同，《今詩粹》中也選錄了其他遺民追懷臥子之作。例如集中錄徐晟(1615-1684)〈讀陳臥子先生乙酉秋日雜感詩有作〉：

遠道關山仗策游，中宵擊楫大江流；雌雄匣啓雙龍夜，騶雉名虛萬馬秋。

剩有布衣思漢曆，曾無鐵騎縱幽州；秋風叢桂吹南國，慟哭當年王粲樓。<sup>139</sup>

又錄任元祥(1618-1674)〈過陳黃門殉難處〉：

亂後春潮急，兵前畫鷁高；湍流衝霧露，日色湧波濤。

斷岸摧邊馬，西風泣戰袍；悠悠芳草暮，存沒愧吾曹。<sup>140</sup>

〈秋日雜感〉十首爲陳子龍晚年的七律代表作<sup>141</sup>，詩中訴說亡國的悲愁以及個人的生命志向，語調沉痛哀楚而猶帶高亢之音，是一組動人的篇章。徐晟讀完此一

<sup>135</sup> 班固：《漢書》，第4冊，卷84〈翟方進傳〉，頁3426-3439。翟義爲翟方進少子，傳文提到：翟義兵敗後，「莽盡壞義第宅，汙池之」，並取反虜之尸「築爲武軍，封以爲大戮，薦樹之棘」。此即陳子龍詩「污宮薦棘」之所指。

<sup>136</sup> 此處也用龍伯國大人釣走六鼈的典故，惟據《列子·湯問篇》，沉海者應爲岱輿、員嶠二山。陳焯編：《國朝湖州詩錄》，卷2，頁1a-b。

<sup>137</sup> 《史記·刺客列傳》記聶政之言：「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又記荊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司馬遷：《史記》，第8冊，卷86，頁2522、2528。

<sup>138</sup> 瀨水女子投江一事，見〔後漢〕趙曄撰，苗麓點校：《吳越春秋》（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卷3〈王僚使公子光傳〉，頁17。另見李步嘉校釋：《越絕書校釋》（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年），卷1〈越絕荊平王內傳第二〉，頁15-16。二書所記稍異，此處採《吳越春秋》之說。

<sup>139</sup> 魏耕、錢价人編：《今詩粹》，卷11，頁26b-27a。徐晟，字禎起，江蘇長洲人。

<sup>140</sup> 同前註，卷9，頁18a。任元祥，後改名源祥，字王谷，江蘇宜興人。

<sup>141</sup> 陳子龍著，施塾存、馬祖熙標校：《陳子龍詩集》，卷15，頁525-528。

組詩後有感而發，遂有前詩之作。詩作首聯先以策馬關山、擊楫中流的豪邁舉止來刻劃陳子龍的慷慨意氣，句中並兼用了祖逖渡江北伐的典故。頷聯則以雌雄寶劍鳴匣而動，化爲雙龍飛去之事<sup>142</sup>，喻指陳子龍胸中不可抑扼的壯志已轉化爲救亡圖存的具體行動；而在奔走國事的過程中，具有騶雜良才的陳子龍不計個人毀譽<sup>143</sup>，仆而再起，終至身殉於萬馬奔騰的紛亂世局。詩作後半段則轉以徐晟的處境發言，在干戈平息、英雄逝去之後，如今只剩一介布衣遙思漢曆，如同王粲登樓般，除了痛哭傷懷之外，已難再有實質的作爲。此詩即在死節與遺民，勇毅與消沉的對比中，彰顯出陳子龍的可貴情操，同時也透露了徐晟心中的無力感。再觀後一首詩，行經陳子龍殉難處的任元祥於詩作末尾道出「悠悠芳草暮，存沒愧吾曹」之句，句中情感更雜糅著生存者對於死難志士的崇敬與愧疚<sup>144</sup>，藉由此愧疚感的反襯，同樣也對照出陳子龍的崇高人格。魏耕與錢价人選取這些詩作，顯然有深意存焉。

明清之際的殉國者難以計數，但兼備詩壇領袖與忠節烈士雙重身分者，首推陳子龍，也因此，魏耕與錢价人獨尊臥子爲當代詩人的典範。雖然《今詩粹》的編成已在順治十六年(1659)，但陳子龍的偉岸形象並非一夕之間形成，而是長期矗立在孚社諸子的心目中，引領著諸子的生命追尋與詩歌創作。

## 六、慷慨悲壯的孚社詩風

魏耕、錢价人尊奉陳子龍爲詩人典範，目的並不在於亦步亦趨的仿擬，而是希望能傳承陳子龍的忠義節操，並接續臥子如初唐般的高華詩風，進一步拓展爲意志更昂揚、境界更開闊的盛唐氣象。但初、盛唐詩的標舉只是指出創作的大方向，並非設下不可踰越的僵化框限，事實上魏、錢二子也認爲，體格聲調固爲詩歌的基礎，然創作的關鍵仍在於詩人如何將澎湃的情思貫注於與之相稱的詩歌格調中，以展現一己之人格精神。今欲論孚社詩人的詩作風格，正可循此脈絡來進行考察。

<sup>142</sup> 此處用張華、雷煥得豐城劍的典故。見房玄齡等：《晉書》，第4冊，卷36〈張華傳〉，頁1075-1076。

<sup>143</sup> 「騶雜名虛萬馬秋」一句較費解，「名虛」當爲虛其聲名、不計毀譽之意。

<sup>144</sup> 未能殉國的羞愧感爲明遺民常有的心理感受，相關的討論可參何冠彪：《生與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擇》（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7年），頁120-124。

孚社詩人中，魏耕有《雪翁詩集》傳世，集中存詩六百餘首。孚社其他成員的作品，則可從《同岑集》（李夏器編）、《國朝湖州詩錄》（陳焯編）兩部地域性的詩歌總集，以及《今詩粹》、《明詩綜》兩選本中考見若干片段。茲將由諸書中所輯得的孚社詩人之作品數量統計如下：

孚社詩人	同岑集	湖州詩錄	今詩粹	明詩綜	重出	總計
錢价人	17	21			4	34
錢纘曾	8	1	28		3	34
朱士稚			53	6	3	56
陳三島			32	9	4	37
錢志熙	9		20			29
錢志焯			2			2

觀上表，扣除各書重出之作，可得錢价人詩三十四首，錢纘曾詩亦三十四首，朱士稚詩五十六首，陳三島詩三十七首，錢志熙詩二十九首，錢志焯詩二首。錢价人季弟錢志燾詩無傳。這些作品雖非全豹，但諸詩作既經各書選家的擇取，故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當足以呈顯孚社群體的詩風樣態。

我們先從詩風最鮮明也最具代表性的魏耕論起。朱彝尊《明詩綜》引徐晟曰：「楚白詩得力于漢、魏，而沉酣于杜、李二家。」又引周質(1623-1687)曰：「白衣銳意學杜，晚一變而神游于謫仙之門，遂升其堂奧。」<sup>145</sup>綜合二人之說，魏耕所學習的前代詩作應包含漢、魏與杜、李，而最終歸止於李白。不過，徐晟、周質之見主要是著眼於詩藝的養成，若就詩人氣質而論，魏耕其實是以建安詩人劉楨再世自許。〈上宗伯錢謙益〉一詩中，魏耕自道：「小謝清標能染翰，前身卻夢劉公幹；分明謫墮千年來，壯心疏豁長貧賤。」〈三月三日夢前身爲劉公幹作〉亦云：「前身知得是劉楨，文采風流著玉京。」酬贈友人潘時升的詩題也再度提及：「稔聞潘子時升仙，人說是陳思後身，而余嘗夢前生爲劉公幹，因戲有此作，兼置酒送潘入燕。」<sup>146</sup>一場夢境，三致其意，足見魏耕在劉楨身上投射了高度的情感認同，而此一情感認同的基礎，則如魏耕詩句所云，在於二人皆具有「壯心疏豁」與「文采風流」的共通特質。魏耕的夢，也令人想起鍾嶸《詩品》對於劉楨的評價：「仗氣愛奇，動多振絕。貞骨凌霜，高風跨

<sup>145</sup> 朱彝尊輯錄：《明詩綜》（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7冊，卷78，頁3845。周質，初名筠，字青士，浙江嘉興人。

<sup>146</sup> 魏耕：《雪翁詩集》，卷4，頁66、卷13，頁180、卷10，頁152。



俗。」<sup>147</sup>憑仗卓犖之氣寫下驚動世人之奇文，又以凌駕霜雪之堅貞風骨超越俗眾之上，這是鍾嶸對於劉楨的讚譽，又何嘗不是魏耕對於自己生命的期許？於是我們讀到〈忼慷歌〉的鏗鏘之句：

猛虎不處卑勢，勁鷹不立垂枝；豪傑徒步言歸，恥就鄉里小兒。<sup>148</sup>

猛虎雄踞，勁鷹高棲，正是魏耕豪傑人格的形象化展演。對照劉楨〈贈從弟詩三首〉其三云：「鳳凰集南嶽，徘徊孤竹根；於心有不厭，奮翅凌紫氛；豈不常勤苦？羞與黃雀羣；何時當來儀？將須聖明君。」<sup>149</sup>二者的生命情調極其近似，詩作中同樣流露出詩人睥睨塵俗的凌雲之志。稍異之處在於劉楨仍然等待聖明之君的出現，以投效股肱之力；魏耕面對的則是國破君亡的殘破世局，此時可以依恃的不是賢聖明王，不是庸俗群衆，而是個人堅定的意志。如〈寄沈士柱二首〉其二云：

生命不常固，天道不常親；操刀擬不割，無以握絲綸。

志士貴決機，盈縮在一人；何須慕黃唐，揖讓相逡巡。

區區仁義言，豈足束其身？<sup>150</sup>

國家亡於異族的慘痛經歷，讓魏耕很清楚的體認到，禪讓之治、仁義之言皆屬空談，此時惟有操刀一割，訴諸武力，才有重新掌握國家絲綸的可能。因此，即使年壽有限，天道無常，魏耕仍然相信志士一人的當機決斷，終能扭轉乾坤，改變天道的屈伸變化。此等豪語，深刻的體現了魏耕的凌霜貞骨。

然而，個人的力量本無法對抗整個世界的崩壞與沉淪，隨著復明行動的連番失敗，魏耕的高昂鬥志也不免轉趨於低沉，觀其詩云：「君抱才華不得伸，我還枯槁遭摧折；一身憔悴絕無成，千里間關阻甲兵。」「佯狂避世無人識，病驢老馬窮途側；囊空金錯衣食少，妻孥啾唧啼四壁。」<sup>151</sup>這些詩句即是事功無成、老病貧困的真實寫照，生命中的種種困厄，使得豪傑志士的作品也無可避免的蒙上了哀戚之感。但魏耕仍不願屈服於殘酷的現實環境，仍欲在枯槁憔悴的生命中超拔而上，故而迸發出悲涼中猶見慷慨，慷慨中仍寓悲涼的詩篇。例如具有典型意

<sup>147</sup> [南朝梁]鍾嶸著，曹旭集注：《詩品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詩品上〉，頁110。下文對此數語的解釋本曹旭注說。

<sup>148</sup> 魏耕：《雪翁詩集》，卷14，頁185。

<sup>149</sup> [漢]孔融等著，俞紹初輯校：《建安七子集》（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卷7，頁192。

<sup>150</sup> 魏耕：《雪翁詩集》，卷1，頁12。沈士柱（?-1659），字崑銅，安徽蕪湖人。

<sup>151</sup> 分別為〈山陰贈朱二十九驛元〉、〈贈潘四古琳〉之句。同前註，卷4，頁65、57。

義的〈彈鋏歌〉一詩云：

我生豈無命，何爲使我漂流天南海北陬？日與腐儒小子論詩書，脣乾口燥不得休。誰言人生直如矢？蒼蒼反覆曲如鉤。不見城中達官騎大馬，殺人多者居上頭？會須覓取百個錢，日醉洞庭岳陽之酒樓。俯觀波濤千里相橫擊，銷我千古萬古之憂愁。<sup>152</sup>

「彈鋏」一詞源自孟嘗君門客馮諼彈鋏而歌<sup>153</sup>，此一詩題本即沉澱著牢騷憤懣、壯志難伸的歷史意涵。詩中，魏耕仍一貫維持著羞與腐儒小子爲伍的孤高，但生命的滄桑飄泊、人生的反覆曲折、異族的殘虐統治，都不斷的震盪著詩人的心靈，銷蝕著詩人的意志。最後，魏耕只能醉酒以銷愁，讓自己暫時從失意潦倒的落寞中縱身而出，將生命的悲愁盡付予千里波濤。此種化悲愁爲放曠的遣懷方式，確實仿擬了李白的豪邁灑脫，即結尾詩句也與〈將進酒〉相近。但李白所欲超越的，是繫於個人生平際遇的哀感，而魏耕試圖銷鎔的千古萬古之憂愁，則是更爲沉重的亡國之恨、故國之思，二者的情感內涵實有區隔，因此，此一慷慨悲壯的音調仍呈顯出魏耕個人的特色<sup>154</sup>。

至於錢价人、錢纘曾、朱士稚、陳三島，諸子詩作雖然各具面貌，但整體觀之，彼此間仍多相契之處。試觀以下四則評語：

錢瞻百价人，二十一史俱綜貫，詩律亦剛勁不靡。

（徐晟《存友札小引》評錢价人）<sup>155</sup>

錢纘曾，字允武，歸安生員。少工詩，清婉綿麗，語必悲涼頓挫，令人流連宛轉不能舍。

（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錄》評錢纘曾）<sup>156</sup>

誦朗詣〈讀史〉詩云：「英雄窮賤盡無策，天下侯王自有時。」慨當以慷，不啻擊缺壺口也。

（朱彝尊《明詩綜》評朱士稚）<sup>157</sup>

崔顥一窺塞垣，語多西涼之氣。若鶴客，衝口橫直，上激風雲，自是劉太

<sup>152</sup> 同前註，卷4，頁69。

<sup>153</sup> [漢]劉向集錄：《戰國策》（臺北：里仁書局，1990年），上冊，卷11〈齊四·齊人有馮諼者〉，頁395-401。

<sup>154</sup> 關於魏耕的詩歌風格，以嚴迪昌先生的論述最爲深入。嚴迪昌：《清詩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8年），頁225-235。

<sup>155</sup> [清]徐晟：《存友札小引》（上海：上海書店，1994年《叢書集成續編》，第155冊），頁11b。

<sup>156</sup> 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錄》，卷12〈生員死義傳〉，頁937。

<sup>157</sup> 朱彝尊輯錄：《明詩綜》，第7冊，卷79，頁3872。

尉一流人詩。

(魏耕《今詩粹》評陳三島)<sup>158</sup>

熟讀二十一史的錢价人，其詩律「剛勁不靡」；錢纘曾詩清婉綿麗，但也有「悲涼頓挫」之風；朱士稚詩「慨當以慷」，有王敦擊壺缺口之豪爽<sup>159</sup>；陳三島詩則如崔顥一窺塞垣之後<sup>160</sup>，風骨凜然之作足以「上激風雲」。由這些評論來看，孚社詩人的詩風大抵也都近於慷慨悲壯一路，可與魏耕之作相呼應。下文即舉孚社諸子的代表作品以相驗證。

先看錢价人〈秋懷〉云：

竹風戰層空，廉利如刀戟；冷魂坐亦颺，鬼神憂空宅。  
 身為逆旅舍，心似遠行客；羈雌狎柔條，涼颿掩長陌。  
 行行重安之？滄波有遺跡；咄嗟笑世人，愛腹不愛脊。  
 腹熱如鎗鏹，脊卷如韋席；失意豪貴門，偃仰自雕畫。  
 弄姿分笑顰，竊影為光赫；水稽不覆山，火蔓不熱澤。  
 老志自孤騫，誰能使相易？<sup>161</sup>

此詩詩題與孟郊〈秋懷〉相同，詩作前數句的意象亦與孟郊詩相似<sup>162</sup>。不過，錢价人寫的不只是秋天實景，更是藉此肅殺之節候喻指國變後的世局。竹風利如刀戟，鬼神憂擊空宅，描繪出清人統治下的恐怖氛圍；幽獨冷魂、離群羈雌，則點出亡國者的孤苦無依。飄泊的詩人在踏訪故國遺跡之後，不禁以怒聲斥笑世人：腹中熱切於功名利祿，背脊卻未能昂然挺立於天地之間。詩人也因而自我期許，將執守振翅獨飛的孤高之志，不與世俗同流，一如水淹不至之高山，火蔓不熱之大澤，永不受外物變遷而更改。此詩以堅定的語句表達出高尙的遺民志節，正展現出錢价人「剛勁不靡」之詩風。

<sup>158</sup> 魏耕、錢价人編：《今詩粹》，卷4，頁25b-26a。劉太尉，即劉琨。

<sup>159</sup> 《世說新語·豪爽》：「王處仲每酒後輒詠『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壺口盡缺。」〔南朝宋〕劉義慶著，〔南朝梁〕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上冊，頁597。

<sup>160</sup> 殷璠《河岳英靈集》論崔顥云：「顥少年為詩，屬意浮豔，多陷輕薄，晚節忽變常體，風骨凜然，一窺塞垣，說盡戎旅。」〔唐〕殷璠編：《河岳英靈集》，收入傅璇琮編撰：《唐人選唐詩新編》（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卷下，頁161。

<sup>161</sup> 李夏器編：《同岑集》，卷4，頁15b。

<sup>162</sup> 孟郊〈秋懷十五首〉其五云：「竹風相戛語，幽閨暗中聞。鬼神滿衰聽，恍惚難自分。」其六云：「老骨懼秋月，秋月刀劍稜。纖威不可干，冷魂坐自凝。羈雌巢空鏡，仙颺蕩浮冰。」錢价人詩句頗脫胎於此。〔唐〕孟郊著，華忱之、喻學才校注：《孟郊詩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卷4，頁160。

《國朝湖州詩錄》選錢纘曾詩，僅錄〈櫻桃〉一首，似乎意味著此詩即為其代表作，詩云：

白日停清晝，櫻桃春熟時；火珠紅欲墮，玉椀摘嫌遲。

恩憶郎官賜，愁添寢廟悲；嘗新同野老，令節竟空移。<sup>163</sup>

《禮記·月令》記載：「仲夏之月……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sup>164</sup>含桃者，櫻桃也，古人獻祭此物於天子宗廟。唐代宮廷制度則將祭畢之櫻桃賜予百官嘗新，王維〈敕賜百官櫻桃〉<sup>165</sup>即記此事，王建〈宮詞〉也有「白玉窗中起草臣，櫻桃初赤賜嘗新」<sup>166</sup>之句。錢纘曾詩寫易代之後，春熟之櫻桃摘採太遲，已無法進獻於寢廟，舊朝郎官也只能回想昔日的帝王恩賜。此時，原本用於朝廷祭享的櫻桃，竟淪為野老嘗新之物，面對如此景象，詩人不免心生令節空移，朝代更迭的傷感。此詩前半段的語句「清婉綿麗」，後半段則宕入陵谷變遷的哀淒之中，確能凝聚出「悲涼頓挫」的況味。

再觀《今詩粹》和《明詩綜》同時選錄的朱士稚〈折楊柳行〉云：

鶴鶴出雲霄，黃鵠參天飛；憤憤世俗間，遠道隨所之。一解。

百川日以東，日月日以西；在生獲笑語，何必故鄉依？二解。

遊盼不恆處，所遇皆新知；邂逅成歡悅，及彼未生疑。三解。

行行過崇朝，豈能若初期？一去自參商，克終有阿誰？四解。

愁來北上堂，撫絃調哀絲；清商間流徵，莫怨他人非。五解。<sup>167</sup>

此詩藉樂府古題刻劃豪傑志士的自我形象。詩人先以鶴鶴、黃鵠的高翔之姿出場，超邁世俗的氣概略如魏耕「猛虎不處卑勢，勁鷹不立垂枝」之句，此中所洋溢的，實是孚社詩人一貫的昂揚意氣。第二解至第四解寫詩人遠遊四方，尋覓知己，相逢固成新知，分別則各自參商。就字面來看，此數章寫的是友朋之間的聚散離合；若進一步推申，則可理解為當時的抗清同志隨著新朝政權的穩固，已逐

<sup>163</sup> 陳焯編：《國朝湖州詩錄》，卷2，頁7a-b。亦見魏耕、錢价人編：《今詩粹》，卷9，頁30b-31a。

<sup>164</sup> [漢]鄭玄注，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本），卷16，頁1a-5a。

<sup>165</sup> [唐]王維著，陳鐵民校注：《王維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卷4，頁303。

<sup>166</sup> [唐]王建著，尹占華校注：《王建詩集校注》（成都：巴蜀書社，2006年），卷10，頁457。

<sup>167</sup> 魏耕、錢价人編：《今詩粹》，卷1，頁6a-b。另見朱彝尊輯錄：《明詩綜》，第7冊，卷79，頁3872。「清商間流徵」，《明詩綜》作「清商變流徵」。

漸失去了原有的理想，能夠堅持遺民志節者，有幾人哉？面對復國希望愈趨渺茫的生命困境，詩人也只能撫絃哀歌，藉清商、流徵的音調，歌詠出「慨當以慷」的獨立人格。

陳三島詩可以〈苕溪道上同魏雪竇作〉為代表，詩共兩首，其一云：

皇輿遭板蕩，戎馬盈帝京；載橐出故關，仗策東南行。  
行行望明漢，參差綴繁星；橫空仄珠斗，逶迤垂大庭。  
顧瞻舊宮闕，蕭蕭吹荒荊；殺身不得便，忠孝難見明。  
悠悠念蒼天，拊心吞臃脰；哀歌和擊筑，意氣不能平。<sup>168</sup>

此詩流露的復國意識極為強烈，語句亦明白大膽，《今詩粹》收錄此類作品於集中，顯然無畏於當時文網。詩作開端直言，國家傾覆於動亂世局，胡人戰馬布滿帝京，表明時節已在國變之後。奔走於恢復之事的詩人，於某個深夜與友人魏耕同行於苕溪道上，遙望皎皎銀河，顧瞻舊時宮闕，因而噴薄出殺身以明忠孝，撫膺吞滅胡人的猛烈壯志。觀陳三島的其他詩句，如「躍馬出戰場，決死夫何疑」，「激昂遠辭親，生死非所籌」<sup>169</sup>，同樣也都表現出不計個人死生的勇毅氣魄，此等詩語誠「衝口橫直」，詩人的不平之意氣則足以「上激風雲」，正與魏耕評語相吻合。

最後附述錢志熙。錢价人之弟志熙、志焯、志燾屬於孚社的次要成員，其中錢志焯詩僅存兩首，錢志燾詩無傳，二人可以略而不論。錢志熙存詩較多，《今詩粹》選錄達二十首，其中五、七言古、律各體皆備，其詩作風格則可參看魏耕的評語：

虞仲英姿磊砢，皎皎若仙……。昨出其七古如〈春女行〉、〈江南曲〉、〈偷薄命〉等篇，思若濯錦，致若迴風。東阿繡虎之譽，端應見屬也。<sup>170</sup>

「繡虎」之說的起源並不甚早，只能追溯至宋代曾慥《類說》引《玉箱雜記》：「曹植七步成章，號繡虎。」<sup>171</sup>曹植七步即可成詩，時人以「繡虎」稱之；錢志熙嘗與兄弟刻燭聯句，亦援筆立就，魏耕應是以才思敏捷的特質來連繫二人。再觀「思若濯錦，致若迴風」之語，又知錢志熙不僅思致迅疾，其構思所得之辭藻

<sup>168</sup> 魏耕、錢价人編：《今詩粹》，卷4，頁27a。

<sup>169</sup> 分別為〈出門〉、〈暨陽道中寄徐禎起許箕屋申莘民諸子〉之句。同前註，卷4，頁27b、28a。

<sup>170</sup> 同前註，卷6，頁53a。

<sup>171</sup> [宋]曾慥編，王汝濤等校注：《類說校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上冊，卷4，頁107。

亦鮮妍如光潔錦緞，而此一華美的詩風，尤可於其七言古詩中見之。例如〈春女行〉云：「二月關河消春雪，春風昨夜來南陌；南陌垂垂官柳新，閨中愁思可憐人。」或如〈江南曲〉云：「江南日晚涼風起，紫閣紅闌愁獨倚；採菱渡頭採蓮歌，聲落江干綠波裏。」<sup>172</sup>詩句皆清綺秀麗，頗能呈顯豪華貴公子的文采風流。這樣的風格雖遠於慷慨悲壯一路，但錢志熙並非孚社的核心人物，尚不致於影響我們對於孚社詩風的整體判斷。

## 七、結語

康熙元年(1662)，魏耕、錢价人、錢纘曾皆因涉及通海案而慘遭殺戮，錢价人諸弟則流放東北，孚社至此宣告瓦解。對於此一曾經散發光熱卻又迅速消沒於歷史長河中的遺民群體，我們可從兩個面向來確立其歷史定位：其一，以明末清初文人結社的風潮來看，孚社為延續復社遺風的清初遺民社團，此社團以砥礪名節、文學復古為結社宗旨，一方面足以步武復社，另一方面也展現了明遺民特殊的生命樣態，堪稱遺民史上的典型群體；其二，孚社諸子取法初、盛唐詩的復古觀念近於七子一派，以明清之際詩學發展的脈絡來看，可視之為晚明雲間詩派的繼起者，特別是魏耕、錢价人合編的《今詩粹》推尊陳子龍為當代詩人的典範，更確立了兩派之間的傳承關係。

但雲間詩派與孚社之間的詩學傳承不純然是理論的延續，更是生命情志的顯揚。蓋雲間詩派之詩學雖是復古詩學、格調詩學，但就深層的精神意蘊而論，也是一種忠義詩學。依陳子龍的詩學觀念，詩歌為「憂時託志者之所作」<sup>173</sup>，即使遭逢亂世，詩人也應在「憂愁感慨之中」寫出「深厚壯拔」之聲<sup>174</sup>，以呼喚盛世的到來。此一詩學思想實寄託著澄清天下之志，陳子龍更將此志落實為生命的實踐，故有忠義詩學的形成。及至孚社詩人，已不再談論雅音興國的理想，轉而強調詩人應將慷慨激昂的意志融貫於詩格格調之中，此一詩學傾向的轉移，表面上似乎背離雲間詩派的理念，但實質上卻凸顯了孚社諸子投身於復明運動的高亢志

<sup>172</sup> 魏耕、錢价人編：《今詩粹》，卷6，頁53b、54a。

<sup>173</sup> 陳子龍：〈六子詩稿序〉，《安雅堂稿》（臺北：偉文圖書出版社，1977年），上冊，卷3，頁165。

<sup>174</sup> 化用陳子龍〈方密之流寓草序〉語，原文云：「今觀方子之詩，於憂愁感慨之中，深厚壯拔，自非盛世，此聲何為來哉？」同前註，卷3，頁152。

節，反與陳子龍的忠義精神一脈相承。近代史家錢海岳(1901-1968)《南明史》將魏耕、錢价人、錢纘曾列入〈忠義傳〉中<sup>175</sup>，可為青史定評，孚社詩學的意義與價值，正應於此熱血澎湃處體認。

---

<sup>175</sup> 錢海岳：《南明史》，第13冊，卷106〈忠義六〉，頁5019-5020。

## 孚社及其詩學考論

謝明陽

「孚社」為順治年間結盟於浙江歸安的明遺民詩社，該遺民詩社以錢价人為領袖，成員尚有魏耕、錢纘曾、朱士稚、陳三島，以及錢价人之弟志熙、志焯、志燾。孚社的成立有意繼承晚明復社的學術遺緒，故社中諸子頗以古文辭相砥礪；另一方面，此派詩人以氣節相交，並暗中從事復明運動，及至「通海案」發生，社中成員或遭逮捕殺戮，或遣戍寧古塔，詩社遂告瓦解。時至今日，除了魏耕因《雪翁詩集》的傳世，作品仍見學者討論之外，孚社的詩學活動幾乎已被遺忘在歷史的洪流中。實則，魏耕與錢价人曾選評當代詩作，編為《今詩粹》一書，此書仍倖存於天壤；孚社詩人的作品也可透過清代的各種詩歌總集，訪得諸多片段，此一遺民群體之詩學猶可考而論之。大體而言，孚社詩人奉守唐調，詩學立場近於前、後七子的復古一路。然而在清初的時空背景下，以遺民身分重倡格調之說，究竟具有何種時代意義？此一詩學主張又將面臨怎樣的困境？本文將針對這些議題進行剖析。特別引人注目的是，依詩歌體裁而編排的《今詩粹》一書，各體均以陳子龍的詩作居首，如此的編輯用意不僅在於推尊陳子龍為當代詩歌的典範，同時也投射了魏耕、錢价人諸子的遺民情志。因此，孚社詩人如何步武陳子龍的詩格與人格，以完成明遺民生命意義的追尋，更是本文所欲進一步探索的深層關懷。

關鍵詞：孚社 魏耕 錢价人 陳子龍 《今詩粹》



## An Exploration of Fu Club and Its Poetics

HSIEH Ming-yang

Fu Club (孚社) was a poetry club formed by some Ming loyalists in Gui An, Zhejiang province,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Shunzhi of the Qing dynasty. It was led by Qian Jieren and other members like Wei Geng, Qian Zuanzeng, Zhu Shizhi, Chen Sandao, and Qian Jieren's brothers Zhixi, Zhitun, and Zhitao. The establishment of Fu Club (孚社) aimed at preserving the academic tradition of the Fu Club (復社)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 Thus, the poets of the later Fu Club (孚社) encouraged each other to maintain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y had another lofty purpose; that is, they were engaged in reviving the Ming dynasty, in secret until the Tong Hai Case, which resulted in the collapse of the club with its members being arrested, killed, or exiled to Ningguta as guards. Until now, the association of Fu Club (孚社) poets has almost been forgotten in the torrent of history, except for Wei Geng, due to the survival of his work *The Collected Poems of Xue Weng*. In fact, *The Essence of Contemporary Poetry* that Wei Geng and Qian Jieren once compiled still exists, and can be the relevant reference for today's study. We can also explore the poetics of the Ming Loyalists by collecting fragments of their poems from various poetry miscellanea of the Qing dynasty. On the whole, the poets of Fu Club (孚社) stuck to the rhyming tradition of the Tang Dynasty. Their poetic stance of restoring the ancient ways is similar to that of the Former and the Latter Seven Scholars. Yet we wonder what significance there is for these leftover subjects to reiterate the importance of classical poetics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early Qing dynasty? And what difficulties would this poetic claim confront? These are the issues this paper aims to discuss and analyze. What draws our special attention is that Chen Zilong's works headed every category in *The Essence of Contemporary Poetry*, which was compiled according to the genre of the poems. Doing so aimed not only to enthrone him as the model of contemporary poetry but also to reflect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Ming Loyalists like Wei Geng and Qian Jieren. Hence, how the poets of Fu Club (孚社) followed Chen Zilong's poetic style and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to give meaning to their lives is the deep concern that the paper further explores.

**Keyword:** Fu Club (孚社) Wei Geng Qian Jieren Chen Zilong  
*The Essence of Contemporary Poetry*

## 引用書目

- 王士禛：《香祖筆記》，《王士禛全集》，濟南：齊魯書社，2007年。
- 王世貞：《弇州山人續稿》，臺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
- \_\_\_\_\_：《藝苑卮言》，收入《歷代詩話續編》，臺北：木鐸出版社，1988年。
- 王建著，尹占華校注：《王建詩集校注》，成都：巴蜀書社，2006年。
- 王逸章句，洪興祖補注：《楚辭補注》，臺北：漢京文化公司，1983年。
- 王維著，陳鐵民校注：《王維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
- 孔定芳：〈清初明遺民的「雲遊」行爲及其意蘊〉，《人文雜誌》，2005年第3期，頁112-119。
- 孔安國傳，孔穎達正義：《尚書正義》，收入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
- 孔融等著，俞紹初輯校：《建安七子集》，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 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
- 朱琰編：《明人詩鈔》，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37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
- 朱彝尊：《曝書亭集》，臺北：世界書局，1989年。
- \_\_\_\_\_輯錄：《明詩綜》，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 全祖望著，朱鑄禹彙校集注：《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 汪涌豪：《範疇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年。
- 杜甫著，仇兆鰲注：《杜詩詳註》，臺北：里仁書局，1980年。
- 李步嘉校釋：《越絕書校釋》，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年。
- 李東陽：《麓堂詩話》，收入《歷代詩話續編》，臺北：木鐸出版社，1988年。
- 李夏器編：《同岑集》，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116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年。
- 李夢陽：《空同先生集》，臺北：偉文圖書出版社，1976年。
- 李興盛：《江南才子塞北名人吳兆騫年譜》，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
- 李攀龍撰，包敬第標校：《滄溟先生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 吳兆騫撰，麻守中校點：《秋笳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 吳偉業著，李學穎集評標校：《吳梅村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 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結社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年。
- 何冠彪：《生與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擇》，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7年。
- 何景明撰，李淑毅等點校：《何大復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
- 何齡修：《五庫齋清史叢稿》，北京：學苑出版社，2004年。
- 宗源瀚等修，周學濬等纂：《湖州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

- 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錄》，《屈大均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
- 孟郊著，華忱之、喻學才校注：《孟郊詩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
- 孟浩然著，徐鵬校注：《孟浩然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
- 房玄齡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
- 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
- 胡應麟：《詩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 高棅編選：《唐詩品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 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
- 孫治：《孫宇台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149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
- 殷璠編：《河岳英靈集》，收入傅璇琮編撰：《唐人選唐詩新編》，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
- 徐世昌編：《晚晴簃詩匯》，臺北：世界書局，1982年。
- 徐珂：《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 徐晟：《存友札小引》，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155冊，上海：上海書店，1994年。
- 徐燾：《小腆紀傳》，收入《清代傳記叢刊》第69冊，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
- 許學夷著，杜維沫校點：《詩源辯體》，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
- 郭憲：《別國洞冥記》，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211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年。
- 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
- 張湛注，楊伯峻集釋：《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
- 張溥：《七錄齋詩文合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38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 陳子龍：《安雅堂稿》，臺北：偉文圖書出版社，1977年。
- \_\_\_\_\_著，施蟄存、馬祖熙標校：《陳子龍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 陳子龍等編：《皇明詩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年。
- 陳去病著，甘蘭經等點校：《五石脂》，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
- 陳國球：《明代復古派唐詩論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
- 陳焯編：《國朝湖州詩錄》，清道光庚寅刊本，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
- 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
- 陳濟生編：《啓禎遺詩》，《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97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
- 陸心源等修，丁寶書等纂：《歸安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
- 陸世儀：《復社紀略》，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43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 馮可鏞修，楊泰亨纂：《慈谿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
- 曾慥編，王汝濤等校注：《類說校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

- 黃宗羲：《南雷詩文集》，《黃宗羲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
- 黃裳：《來燕榭讀書記》，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
- 楊賓：《楊大瓢先生雜文殘稿》，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126冊，上海：上海書店，1994年。
- 楊鳳苞：《秋室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47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 趙擘撰，苗麓點校：《吳越春秋》，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
- 鄭玄注，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收入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
- 歐陽修、宋祁等：《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
- 劉文典撰，馮逸、喬華點校：《淮南鴻烈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劉向編：《戰國策》，臺北：里仁書局，1990年。
- 劉莞莞：《復社與晚明學風》，臺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5年。
- 劉義慶著，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 錢海岳：《南明史》，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 謝國楨：《明末清初的學風》，上海：上海書店，2004年。
- 薛瑞泉：〈魏耕和清初的「通海案」〉，《中國史研究》，1989年第1期，頁115-119。
- 鍾嶸著，曹旭集注：《詩品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 魏耕、錢价人編：《今詩粹》，清初刊本，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 \_\_\_\_：《雪翁詩集》，收入《四明叢書》第2集第5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
- \_\_\_\_：《雪翁詩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
- 嚴羽著，郭紹虞校釋：《滄浪詩話校釋》，臺北：里仁書局，1987年。
- 嚴迪昌：《清詩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8年。